

# 政治經濟發展：台灣與東亞國家經驗的檢視

吳親恩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奕孜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回顧近年來政治經濟發展的研究。文中處理兩個主要的議題，第一個是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包括產業政策以及經濟自由化政策。產業政策部分討論贏家挑選政策、產業政策實踐上的差異、技術官僚與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影響發展途徑選擇的結構性因素，以及近年來發展型國家的轉型。其次，發展國家論的著重在工業政策，對經濟自由化政策常以經濟發展的另一種選項視之。本文討論國家如何交互使用這兩項政策，另外也分析影響經濟改革推動的制度與結構性因素。挑選贏家的過程中需將資源分配到最有潛力的部門，經濟自由化改革也需移除壟斷與保護，都面對政治壓力。因此，本文著重分析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政策時所面臨的政治壓力，以及在哪些條件下可以克服這些反對。本文另一個主題則是回顧所得分配與社會安全的課題，討論影響東亞與台灣社會安全保障制度發展背後的政經因素，影響民眾所得重分配偏好的要素，以及所得分配對於民主體制支持與穩定的作用。

**關鍵詞：**發展型國家、工業政策、經濟自由化、所得重分配、民主體制支持

## 壹、前言

本文回顧政治經濟發展的研究，文中處理兩個議題，首先討論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這主要有兩個部分，一是國家提供市場制度、法治、財產權保護、教育以及基礎建設等公共財。依照古典經濟理論，國家在發展經濟中的角色主要就是這幾項，其他的就留給市場來決定。另外一個則是國家透過產業政策來促進工業與經濟的發展。這部分的討論也常被稱為發展國家論（developmental state），討論的內容主要是國家以政策扶植特定產業。許多發展中國家認為要脫離中等所得的陷阱，工業政策是不可或缺的一環（Norman Akbar and Joseph E. Stiglitz 2016）。近年來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製造業的崛起，工業政策也再度在西方工業國家受到重視，因為他們瞭解到製造業對經濟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性（Andreoni 2016）。且若要保持經濟發展領先的地位，政府攜手民間合作投入研發仍非常重要。當然，近年來工業政策重新抬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國族主義為基礎的民粹主義興起，促成保護主義的強化，保護的對象往往是不具競爭力的產業（Aiginger and Rodrik 2020）。

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這部分，本文要討論的議題包括產業政策以及市場制度建立，也就是經濟自由化政策。產業政策部分會回顧發展型國家的贏家挑選政策、不同國家產業政策實踐上的差異、技術官僚與統治者間的關係、影響產業政策的結構性因素，以及近年來發展型國家的轉型。其次，經濟自由化政策這部分，其也是發展政策的一環，在挑選贏家的過程中，缺乏市場制度的建立，例如貿易、財稅與金融改革，則產業政策的效果勢必打折。這部分會討論東亞國家的經濟改革經驗，以及政策選擇背後的制度與結構因素。與經濟發展政策緊密相關的是分配的議題，這是本文的另一項討論重點。重分配議題雖然著重在分配經濟果實，但也與發展有關，過高或過低的社會福利都可能影響發展。對此，我們將討論東亞與台灣社會安全保障制度的發展，影響民衆所得重分配偏好的因素，以及所得分配對於民主體制支持的影響。

## 貳、產業政策

### 一、贏家挑選

產業發展過程中常出現資金、外匯以及資訊匱乏的情形，對此，發展型國家模式有幾項常見的工作重點。首先，政府協助累積資本，這涉及將農業資本移轉入工業投資，以及透過政策鼓勵儲蓄，減少短期的消費，以增加長期工業投資的資本。其次，技術官僚依據比較利益的原則，挑選產業或企業的贏家。這包括兩種方法，首先是直接挑選特定有潛力的企業，當一個國家在進行經濟轉型、發展新興產業，因為市場資訊不足，企業與資本不敢貿然投入未來有潛力的產業，政府扮演類似投資銀行的角色，規劃投資方向、籌集資金、技術協助與選擇經營者。且若私人沒有意願時，國家率先投入成立國有企業，但之後進行私有化（Chang and Zach 2019）。另一種方法是間接的挑選贏家，發展型國家選定有潛力的產業，透過財稅、信貸與利率等扶植政策，協助具出口能力與發展性的產業（Wade 2004; Haggard 2015）。此外，挑選贏家的過程中，為保護幼稚工業，常給與關稅與非關稅保護。最後，各種產業扶植政策的持續給予都是條件式的，東亞政府將獎勵與保護政策和企業的出口與成長表現掛勾在一起（Amsden 1989; Wade 2004; Haggard 2015）。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發展國家論認為，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主要任務是透過產業等政策來提升一個國家在國際生產分工中的位階（Evans 1995; Kasahara 2013），因此需要國家與民間部門間的合作，降低產業升級與創新所面臨的風險（Chu 2002; Wong 2005; Lin and Chang 2009; Cherif, Reda and Fuad Hasanov 2015）。Rodrik（1995）指出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協調問題，特別是如如何匯集資金與人力籌組工業投資計畫，政府透過信用分配、稅收補貼、直接投資或設立公有企業來推動產業發展。要達成產業升級的目標同時也需強化基本公共財的提供，例如提供中等教育以及基礎建設（Kasahara 2013）。

發展國家論認為工業升級有市場失靈的問題，需要政府介入（Amsden 1989; Wade 2004）。新古典經濟學家則指出政府的資訊不見得會比私人來得充足，儘管有市場失靈的情形，但政府介入所引發的政府失靈問題可能更嚴重，

例如競租 (Krueger 1995)。Okimoto (1989, 50-51) 區分一個國家產業的生命週期，指出日本工業政策扶植的對象，一方面是剛萌芽階段的工業，另一方面是衰退階段工業。Hatta (2017) 也指出日本的產業政策很多只是在保護夕陽產業。Hatta (2017) 也指出私人投資，要自行承擔失敗的後果，需小心翼翼；文官規劃的工業政策，若政策失敗，並不需要負擔太大的財務責任，因此是否會善用資源是有疑問的。World Bank (1993) 分析東亞的成功經驗，並未承認工業政策的角色，認為傳統的新古典經濟藥方，包括貿易自由化、強化法治、改善經商制度、金融深化、物質與人力資本累積與基礎建設等，才是促成發展的重點。

不過Cherif 和Hasanov (2019) 指出，有很多國家有很高的資本投入，或是經商環境與基礎建設品質取得很好的分數，但卻沒有相應的提升生產力與出口產品複雜度。Rodrick (2005) 與Cherif 和Hasanov (2019) 則認為就算是推動結構性經濟改革，去除掉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也不保證可以帶來產業的發展，因為還存在著市場失靈。例如智利在1970年代開始推動自由市場經濟改革，卻沒有讓具有出口能力的製造業自然而然發展。<sup>1</sup>另外，新古典經濟學本身也能為工業政策提供一些學理支持，首先，在進行產業創新面臨比較高的風險時，企業通常不太願意進入這個領域，這時國家如果能夠提供資金以及保護，就比較能夠鼓勵企業投入 (Hausmann and Rodrik 2006, Lin and Chang 2009)。

Cherif和Hasanov (2019) 認為市場失靈不會自己解決，需要國家的介入，但介入的方式應盡量貼近市場機制。他們歸納東亞工業政策的成功經驗，有三點為關鍵，一是國家將資源與生產要素投入基於現有自身稟賦但尚未能生產的製造產業。Cherif和Hasanov (2019) 指出，東北亞國家，都是投入那些比其原先秉賦所能生產的更高階的產業，例如電子業、汽車工業與造船業。Chang也以韓國經驗指出，工業升級必須大膽投入著重於技術層次比自身國家比較利益更高一些的產業，才能升級 (Lin and Chang 2009)。Lin於同文也指

<sup>1</sup> 當時智利大幅降低關稅與貨幣貶值後，進出口出現顯著增加，成為讓傅立曼引為自由經濟成功的例子，但幾年後證明，智利並未能出現產業的升級。

出國家要做的是改善勞工、技能與資本等秉賦，使其能在比較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具有比較利益。不過工業政策推動後，發現不具比較利益時，必須果斷轉進扶植具有比較利益的產業（Perkins 2013）。二是出口導向，這樣才能面對國際競爭，同時取得規模經濟；若採取進口替代，存在著過度保護且市場規模過小的問題，無法帶來產業的發展。第三點則是政府對於接受保護與獎勵的企業依其成效對其問責。Nishijima（2012）指出日本通產省認為工業政策的保護必須有時間的限制，時間到了，對於取消保護沒有任何妥協，企業知道，只有想盡辦法改善品質、增強競爭力才能生存。在這樣的政策下，國家較能走向以創新為基礎的發展途徑。

對於工業政策成效的量化實證研究，許多是比較同一個國家不同產業，分析是否受到產業政策獎勵與保護的產業，比那些沒有受到相應政策影響的產業表現得更好。許多實證分析發現保護政策對於產業的發展並沒有具體的功效，甚至表現更不好，沒有接受補助的企業反而表現比較好（Lawrence and Weinstein 2001; Pack and Saggi 2006）。Harrison 和Rodriguez-Clare（2010）回顧許多針對不同國家的實證研究，總結認為大部分的研究得到類似的結論，且理論上工業政策的適用對象應該是市場失靈的情況，特別是幼稚工業，但是有許多的國家的工業保護政策，是爲了政府財政收入，或是爲了保護那些沒有競爭力或沒落的夕陽產業，反而是出口產業不容易得到政策補助。

另一些實證研究則發現工業政策有一些正面的效果。Harrison和Rodriguez-Clare（2010）指出保護政策與企業表現間關係並不顯著，但出口補貼比關稅保護來得好，因爲前者中企業還是要面對國際競爭；其次，政府與企業可以合作，致力於技術研發與升級。Lehmann和O'Rourke（2011）的研究區分產業的類型，發現如果保護給與的是具有正外部性的產業，其技術與知識可以外溢到其他產業，則可以帶來經濟的成長，但若保護給與的是不具有正外部性的產業或衰退產業，則無法帶來相應的效果。另外有些研究的結論比較中性，探討工業政策對於新興產業發展的作用，同一個國家中，同樣的扶植，有的成功有的失敗。跨國來看，對相同產業的扶植政策，緊扣產業比較利益的政策成功的機率較大，野心過大的產業扶持政策通常會失敗（Petri 1997）。另外，針對韓國1970年代的研究發現，受保護產業的規模與產出的確比較大，

但不見得比未受保護的產業發展得更好，不過許多受扶植的產業的確是發展起來了，也能夠在國際競爭中生存下來（Choi and Levchenko 2021; Kim, Lee, and Shin 2021）。<sup>2</sup>

## 二、實踐上的差異

政府透過干預市場來促進工業發展，這不只出現在東亞國家，也出現在拉美及許多歐美老牌工業國家中，歷史上許多工業先進國家也不同程度的採取許多鼓勵工業發展的政策（Cherif and Hasanov 2019; Terzi, Singh, and Sherwood 2022）。常用的方法包括補貼、政府資金投入、關稅保護、發展教育、投入研發等（Ormrod 2003; Chang 2008; Caldenteu 2008; Wade 2014; Andreoni and Chang 2019; Cherif and Hasanov 2019）。不過不同國家在產業政策施行上有所差異，不一定會符合上一節指出的幾項原則。包括是否鼓勵民營、鼓勵出口競爭、依比較利益原則將資源投入有潛力的產業，以及能否對受保護的企業依表現問責等，都可能出現差異，這都會影響政策的結果。

不同於東亞國家的工業政策短時間內從進口替代走向出口導向，拉美國家則是較長的時間一直維持進口替代。Katz和Kosacoff（2000）與Silva, E.（2007）指出智利與阿根廷也選定幾個具潛力的產業，透過資金補貼以及關稅與匯率等政策來保護這些產業，形式可能是公營或公私合營。但與東亞國家不同，採取進口替代策略，選擇發展的是資本密集產業，以及鼓勵與貿易與私營企業發展相反的路徑。首先，對國有企業相當樂觀，透過提供低利貸款等方式扶持國有企業工業化，但是這些工業並不具國際競爭力，只能透過關稅與其他貿易障礙保護製造業。其次，則是高估其幣值，因為這些企業高度依賴從國外進口機器與重要零組件等資本財，高估幣值可以降低進口品的價格

---

<sup>2</sup> 另外，工業政策經濟效果的實證研究常面臨將一個內生變項（工業政策）對另一個內生變項（產業的興衰）進行迴歸分析，因為工業政策的選擇與產出都可能同時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沒有國際競爭力的夕陽產業更會尋求政府的援助與保護，所以很多工業政策的幫助對象是沒有競爭力的產業，不管有沒有工業政策的保護，這些產業都一樣會衰落，統計結果自然呈現出工業政策沒有效果。而晚近工業政策的實證研究更重視因果分析，包括使用自然實驗與因果推論設計，儘可能確保一個產業是否受到工業政策的獎勵是外生的（Aiginger and Rodrik 2020; Lane 2020）。

(Armendáriz and Larraín 2017, 66)。然而，這樣政策的結果是國際收支不平衡、高外債與高通膨。這些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包括進口替代產業的企業與勞工會遊說政府，讓這個政策持續 (Krueger 1995)。此外，這類工業雇用的人力相對較少，對於創造就業機會幫助有限，無法充分吸納農村過剩的人口 (Baer 1972)；同時也促使貧富差距的拉大，農村地區的剩餘人力移到城市中，只能在非正式的部門工作，或出現就業不足的現象，產生嚴重的貧富對立問題 (Armendáriz and Larraín 2017, 66-71)。

Katz和Kosacoff (2000) 指出阿根廷的進口替代工業化，並未像東亞國家一樣，給與產業壓力要求其提升競爭力或強化出口，而且依賴國內市場，不僅企業規模較小，更缺乏競爭力。此外，Silva (2007) 與Armendáriz and Larraín (2017) 指出，進口替代其實不只包括產業政策，也包括社會保障政策，因為智利為民主國家，政策的推動都要建立在政治聯盟的組建與支持上，在推動進口替代的過程中，除了要有工業家的支持，也需有勞工的支持，所以勞工在無效率的國營企業中，獲得過高的薪資。Kay (2002) 指出，拉美國家在實施進口替代之前，地主階級控制了國家官僚機構，因此無法有效推動土地改革、移轉農業資本入工業。同時拉美是民主國家，官僚面臨富裕階級與勞工階級的雙重壓力，無法如東北亞國家一樣，要求企業遵從市場紀律，反倒是不斷給予沒有競爭力的企業保護與補貼，政府希望能鼓勵出口，但是卻沒有成效。

嚴格來說東亞發展模式與拉美模式中，都有進口替代的部分，但是東亞同時鼓勵出口 (Haggard 1990; Manger and Shadlen 2015)。例如台灣在採行出口擴張政策之後，對於一些工業製品採取進口替代的保護措施，以保護國內幼稚工業。一直要到1980與1990年代，採取經濟自由化措施以及要加入WTO，才大幅減少關稅保護。不過東北亞國家的進口替代，主要目的並不著眼於國內市場，而是希望該項工業發展後可以具有國際競爭力而出口，對於保護的程度與時間上均有限度，這與拉美所建立的進口替代保護維持很長的時間且著眼於內需市場不同。且在東北亞比較成功的案例中，主要是比較趨近市場機制，例如利用充沛的廉價勞動力、良好的基礎設施、發展的產業符合其比較利益，並搭配符合其競爭力的匯率 (Krueger 1995)。積累了相當的技術與資金之後，才試圖轉進到技術層次更複雜但資金需求更高的產業中。與此類似，泰國與馬

來西亞都想發展汽車工業，但泰國依照比較利益原則，引進國際投資發展汽車組裝工業，發展相對成功；而馬來西亞的汽車發展政策則採取長時期的保護，且因為獨厚本土馬來資本，但技術無法持續升級，因而發展受限（戴萬平 2010）。

而以台灣的經驗來說，政府的角色首先是直接扶植個別企業，早期企業規模較小，技術與資訊均不足，對於要投入新興產業有所遲疑，政府扮演類似投資銀行的角色，主動發掘可行的投資計畫，尋找經營人、提供資金，或先創辦企業再轉民營，並監督此一機構的經營成效（葉萬安 2020）。1970到1980年代台灣邁入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產業時，這類企業投入資本大、風險高與回收期長，也需要政府的介入。若民間有人有能力與意願經營則由政府參與投資，但由民間來經營，例如政府規劃發展半導體產業，協調海外技術、人才與政府資金，由政府承擔風險，陸續成立聯電與台積電（許增如 2019）。若民間無人有能力與意願經營，則先成立公營企業，但即使是公營，在人事與預算上也儘量獨立於政府監督，例如中鋼的情形（張守真 2001），且數年之內即開放市場，使之面對國際競爭，例如取消中鋼對進口鋼品的加簽權，使其必須面對國際競爭（劉玉珍 1995）。

其次，則是透過信貸與稅賦獎勵來鼓勵投資、外銷與發展策略性產業。台灣的產業發展從出口擴張時期開始，就強調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sup>3</sup>威權時期創建的幾項鼓勵外銷與產業發展的政策，在民主化之後延續至今，包括獎勵投資條例、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工研院等技術研發機構。1990年獎勵投資條例被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取代，主要是從產業別的獎勵轉為功能別的獎勵，但是保留策略性產業投資五年免稅的規定，可以二選一，影響的結果是租稅獎勵大部分都是用在資本支出的獎勵，而非功能別的項目。這使得當時屬於技術變遷與資本折舊都快的面板與半導體產業，競相不斷擴產，擴大了規模卻沒有太多創新。2009年修法強調創新，只剩下功能別的研發投資抵減（陳添

<sup>3</sup> 對受產業保護的產業的關鍵零組件，政府有自製率政策，以促使產業發展，不過產業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于宗先、王金利 2003）。以汽車工業為例，長年給與進口管制與關稅和國內市場保護，政府透過要求逐年提高自製率來促進產業升級，但並不成功（洪紹洋 2020）。



枝 2022)。最後，台灣產業政策在1970年之後的另一個重要環節是政府對研發的協助，透過設立工研院等技術研發機構，協助廠商突破技術的瓶頸，然後交由廠商商業化（陳添枝 2022）。

中國與越南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也有各級政府積極的介入，不管是資金與稅收、土地與人力方面的協助，另外在發展經濟的企圖上也是類似的。政府也是依據比較利益的原則，依賴豐沛的勞動力，發展加工出口產業。但是與東亞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路徑還是有所不同。首先，中國與越南的發展起點是社會主義體制，改革開放後雖有放鬆管制，但國營企業的比例一直偏高，且兩地執政黨都會擔心私人企業壯大後對於政權穩定產生影響，在開放一段時間之後，又開始限縮鼓勵國有企業擴張與限縮私人企業，國營與國家控股的企業重要性依舊鞏固（Huang 2008; Chi, Le, and Diem 2020），這與其他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間有明顯的差異。且以國有企業為主的發展模式面臨了軟預算限制（soft budget constrain），是相對無效率的，國家的補助主要以國營與國家控股的企業為主，在這種產權結構下，政府對企業的監督能力不足，無法有效要求其提升表現（Fuller 2016）。而且政府與企業常常進行運動型（campaign）的工業政策，短期內設定過高的目標，最後多是炒短線，無法達成促使產業升級的目標（Fuller 2016; He, Alex 2021）。而要維持經濟成長的動能，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逐漸轉移到以私營經濟為主體的型態（Lardy 2014），但這又是威權體制所不樂於見到的。

### 三、技術官僚與統治者

有效產業政策的一些要素，如依照比較利益原則將資源投入有潛力的產業與對之問責等，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並無法做到，這無非是因為其身處的政治經濟條件無法配合。學者指出，在探討出口擴張與進口替代等不同貿易途徑時，也應探討個別國家選擇或被限制在不同途徑所鑲嵌的政治經濟條件（Manger and Shadlen 2015）。國家挑選贏家會面對政治壓力，Robinson（2009）指出許多國家都推動了工業政策，但是成功的國家不多，這些國家集中在東亞，而在東亞國家中也不是全然成功，不過東亞國家與其他區域國家有很重要的差別，在一些非東亞國家中，工業政策類型、產業與廠區位置等選

擇並不完全是由專業決定，也被政治因素所影響。

許多學者指出技術官僚在國家引領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若沒有專業能力的技術官僚加以規劃與執行，要有效進行經濟資源分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Haggard 2015）。Evans（1995）與Fukuyama（2013）提到鑲嵌的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官僚在決策時必須與民間密切諮詢，但是同時要有自主性，才能夠抵抗特殊利益的壓力，不然政府與社會的鑲嵌關係會沉淪為競租。在侍從主義盛行的國家，政府的產業政策往往無法投入那些最具有潛力的企業，政治盟友、軍隊、政黨都可能取得特許產業的經營權。

技術官僚的角色能否發揮，統治者的支持是關鍵，統治者不支持，則官僚的自主性就不存在了，這因素在民主與威權體制中都重要。民主政體面臨選舉的壓力，容易受即期消費、重分配要求和特殊利益者所左右，不利於經濟發展（Bhagwati 1982）。民主政體下政府即使有充分的資訊，也無法制定出有利發展的工業政策（Munger 2022）。例如在泰國，官僚想要取消對紡織業的保護時，卻無力抵抗來自選舉產生的部長施加的壓力，其希望繼續利用保護政策做為給與選區樁腳的優惠（Petri 1997）。此外，相較於民主政體中面臨許多否決者的情境，獨裁政權中的決策者在分配資源上較能迅速採取行動，這在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中可以發現類似的經驗（Amsden 1989; Wade 2004）。不過在實證上，1980年中期之前，東亞四小龍的政體都是非民主體制，沒有文化與所得相近的民主國家可為對照，來證實威權體制真的比較好。另外如泰國的例子，不管是在民主還是威權時期，大財閥與執政者都緊密相連，官僚都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Kanchoochat, Aiyaram, and Ngamarunchot 2021）。

與統治者支持相關的因素是政治穩定，技術官僚能夠引領經濟發展的根本基礎是政治安定，否則統治者無力提供保護，官僚也無法規劃與推動發展計畫，台灣也不例外，在經歷二戰與內戰的動盪後，1952年陳誠說「我們終於有時間可以進行有計畫的經濟建設了」（王作榮 2002）。Yülek等人（2020）比較韓國與土耳其汽車工業的發展，指出兩個國家差不多同時在1960年代開始發展汽車工業，都採取保護幼稚工業的政策手段，但是後來的發展差異很大，作者指出其中的關鍵因素是國家能力不同所造成，國家能力最主要的就是政治穩定，另外也包括發展具出口能力產業的決心、官僚規劃與執行能力與扶

植科學研究機構等，以增強技術能力，及去除保護、鼓勵出口。<sup>4</sup>

另外發展型國家模式中，因為技術官僚負責資金的分配，但挑選的贏家不一定會成功。而因為技術官僚分配的是公家的錢，必須負相當的政治或甚至法律上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面臨被彈劾或者被司法起訴的命運，例如尹仲容與李國鼎的例子。在威權體制的環境下，比較可以免除技術官僚個人受到國會、監察與司法機構的問責，否則技術官僚必定不願冒風險將政府資金投入高風險、不確定性高的新興產業中。韓國的情況也類似，技術官僚對其所做的決定所須負擔的責任很小，這使其願意選擇扶植風險性高的產業，不過這也造成過度投資與不擔心市場紀律的問題（Kim and Leipziger 1997）。不過隨著發展型國家模式的轉變，相關問題越來越小，因為政府的補貼從針對個別企業的補貼，演變到針對某個產業的補貼，最後則是功能性補貼，越來越不是針對特定的企業進行補助。<sup>5</sup>

技術官僚的角色能否發揮，也與企業型態有關。首先是所扶植的企業所有權類型，國有企業普遍面臨了軟預算限制，企業沒有倒閉的擔憂，主管機構不易要求其改善，例如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監督能力一直不足，無法有效要求其提升表現（Fuller 2016）。韓國的經驗也顯示產業結構的影響。1970年在推動重化工業之後，國家將資源集中在特定的產業上，官僚負責挑選適當的企業來加以扶植。這個階段，搭配上銀行的國有化，國家擁有融資的政策工具，企業也在發展中，需要國家的扶植（Park 2018; Lane 2022）。因為重化工業的特色，著重經濟規模，企業規模大較有利，這也促成財閥的擴張。而這樣的產業結構造成財閥有恃無恐，認為即使投資失敗，國家也不會讓其倒閉。在這種情形下，官僚缺乏足夠的工具來對財閥問責。1980年之後，韓國開始減少產業政策的使用，不過政府的干預依舊，且財閥太大不能倒的問題也依然存在

---

<sup>4</sup> 從另一方面來說，經濟發展以及開放的貿易政策也會影響內戰的發生（平思寧 2014）。

<sup>5</sup> 官僚的能力也與其掌握的政策工具有關，泰國工業化過程中，官僚著重總體經濟穩定，對市場基本上採取放任政策，鼓勵外資，對於本國企業的工業升級著力較少。本土的工業化是由大財閥所擁有的銀行來融資，其目標不是鼓勵策略性工業發展（Kanchoochat, Aiyaram, and Ngamarunchot 2021）。

(Park 2018)。在民主化之後，政黨在選舉時需要政治獻金，政府對財閥的指引與監管能力更加弱化（林文斌 2010; Park 2018）。且此時財閥日益茁壯，能自行籌資，不需要政府的幫助，加上經濟自由化的發展，政府的政策工具減少，政府對企業決策的影響更為降低。

此外，政府財政上對關稅的依賴程度也是一個影響因素，指出，拉美國家對內徵稅能力不足，出口關稅與印鈔票一直被當成是重要的財政來源。在採取進口替代策略時，高關稅不利於出口，阻礙工業的發展（Caldentey 2008）。且在貨幣幣值高估的前提下，要保護產業必須依賴高關稅，但政府威脅要降低關稅來要求企業改善其出口競爭力，威脅性較低，無法取得激勵廠商的效果，因為高關稅是拉美政府的重要財政來源，要降低關稅，會減少政府的財政收入，實際上不太可能出現，因此威脅效果不大（Amsden 2001; Manger and Shadlen 2015）。相對來說，東北亞工業扶植政策中以減稅與優惠貸款為主，若要取消對企業的稅收減免與資金援助，可以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是比較有威脅性的政策工具。

#### 四、結構性影響因素

有效的產業政策推動，背後更有歷史、國際與社會等結構性因素，影響政府的決策。首先，出口擴張策略要面對全世界的競爭，不確定性高，國家為何會願意承擔風險採取這項策略？Haggard（2018）、Lauridsen（2008）與Robinson（2009）指出外來威脅驅使東亞中小型國家積極的提升工業。Krueger（1995）與Haggard（2015）則指出大的經濟體與豐沛的自然資源會使決策者認為可以依賴內需來發展，而採取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反之，則驅使一國往出口導向的方向發展。例如，由於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而使得智利只願意擷取容易取得的經濟租，而不願意升級產業（Palma 2019）。Wu（2012）指出，威權體制雖然缺乏選舉誘因，不過在面對外在威脅以及自然資源不豐沛的條件下，威權統治者有較高的誘因提供公共財，使民主與威權政體在發展經濟的表現上接近。Mahon（1992）也指出相較於東亞國家，拉美國家因為有豐沛的自然資源出口，使其不願意採取貨幣貶值來強化工業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使其持續採取進口替代的策略。1950年代末期，台灣之所以推動

出口擴張與貿易相關改革，主要是因為美援逐年減少，面對國際收支不平衡，必須鼓勵出口，且加上台灣經濟體範圍小、面臨外在威脅、缺乏自然資源可以支撐，所以必須選擇加入國際分工，採取市場開放措施（康綠島 1993）。<sup>6</sup>

另外一個近年來出現的議題是發展的思維與決心，發展型國家的一個重要基礎是執政菁英的發展思維（developmental mindset），包括發展企圖與發展共識，必須透過適當的制度與政策安排，來達到追求的目標（Thurbon 2016）。Cherif、Hasanov和Kammer（2016）指出政治領導人的決心很重要，要能發展工業，必須要有決心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有能力出口的產業。發展決心很大程度與一個國家面臨的生存威脅以及資源秉賦有關，Evans和Heller（2019）指出東北亞國家生存威脅的影響。瞿宛文（2017）也指出執政者發展意志的重要性，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歷經亡國的挫敗，使遷台的執政者與技術官僚體認到這是他們最後與唯一的一次機會了，因而努力尋求將經濟發展起來。許增如（2019）也指出官僚與統治者的決心是創立科學園區與扶植半導體產業的關鍵。外來威脅的效果，也有反證，例如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衝突（Chang and Zach 2019）。不過印巴之間比較是宗教與小規模的軍事衝突，並非經濟體制與國家生存之爭，是否可以類比，值得更多討論。

其次，社會結構方面，很大程度與侍從主義及財富分配情形有關。首先，在侍從主義盛行的國家，技術官僚無法擺脫政治干預，做出有效的資源分配，國家機構常被特殊利益所捕獲，工業政策主要是提供政治關係良好的產業或企業政策優惠，例如在突尼西亞，存在強大、政治關係良好的集團，技術官僚根本不可能做出正確的選擇，或能夠依企業表現對其進行獎懲，工業政策反而是強化對這些大集團的優惠照顧（Cammett 2007）。另外如東南亞國家，經濟活動集中在少數與政府關係緊密的企業中，政府無法要求其改善表現，並對其問責（Montes, 2019）。Underhill和Zhang（2005）指出，私人企業的偏好與參與是泰國重要工業政策制訂的關鍵，1980年初期轉往出口擴張的原因之一，是泰國當時出現一批依賴廉價勞力、具外銷能力的企業，大財團也參與其中。

<sup>6</sup> 張文揚、詹捷翔與平思寧（2019）的研究指出，雖然自然資源的豐沛會阻礙經濟發展，但是民主體制中，因為有較好的治理，避免了自然資源的詛咒。

但在1990年代之後，泰國的出口產業被跨國企業壟斷，本地企業無法有效升級，加上本地市場自由化，大企業開始轉向重化工業與內需市場，並持續要求國家保護。這顯示企業集團力量過於強大，官僚相對缺乏引導的能力。

其次，Hirschman（1968）指出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因為工業化起步階段需要移轉農業資本到工業投資，拉美缺乏土地改革，無法有效移轉出農業資本，只好透過高估幣值來間接進行移轉，如此不利於商品的出口，但有利於壓低機器與原料的進口價格。Robinson（2009）也指出拉丁美洲國家社會經濟資源分配不均，地主階級政治力量強大，技術官僚要推動工業政策，將資源從農業移轉到工業發展有困難。Kay（2002）指出，東北亞地區農業改革早於工業化，農業改革包括土地改革與農產品價格控制等，將農業部門的剩餘移轉來到工業部門，以公司股票補償地主也鼓勵地主搖身一變成爲企業主，使所得分配更平均，也擴大了國內市場。而拉美國家則相反，工業化早於農業改革，且因爲地主反對，土地改革進展遲緩。之後在土地改革過程中鼓勵地主變身爲企業主方面，因爲地主對政府不信任，資金也不夠，並不成功。其次，土地改革會驅使一個國家加快放棄進口替代策略。首先，土改後農地面積狹小，農產品要大量出口根本不可能，這時只能往出口擴張著力（Perkins 2013）。其次，就重化工業的進口替代來說，當一個國家具有可以出口賺取外匯的產業如農業時，進口替代政策可以延續很久，但如台灣缺乏這樣的條件，因而進口替代政策推動期間相對短暫（Lauridsen 2008）。

此外，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社會基礎是充沛與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可以投入職場或從事創業，但若一個國家陷於所得分配嚴重不均的情況，勢必有很大一群國民無法受到良好的教育，使高素質的勞動力這個條件難以達成，且使得在既有寡頭集團之外要浮現新興的企業變得困難，而使產業發展受限。Kanapathy等（2014）指出，經濟政策等因素雖然是造成中度所得陷阱的直接因素，但是其背後有更深層的政治因素，所得分配不均造成這些國家少數政治與商業菁英壟斷經濟活動，也影響了教育機會的平等。既有的東北亞發展型國家，在發展初期推動了土地改革，使社會所得分配平均，並讓中等教育普及，有利於產業的發展。在東南亞國家方面，如泰國教育支出普遍比東北亞國家來

得低，這勢必無法支撐產業升級（Lauridsen 2008）。<sup>7</sup>

在同樣採行出口擴張的國家，東南亞與東北亞國家採取類似的政策，包括出口擴張、鼓勵自有品牌發展、發展國內協力廠商與增加自製率，但是產業發展的結果並不一致（Cherif and Hasanov 2015）。比較台灣及南韓與馬來西亞及泰國的發展，都是以出口為導向，但兩組國家在本土技術的創造上差異很大，台灣及南韓的研發支出比例較高，政府設立機構協助研發，經濟以本地企業為主，掌握自我技術，且企業的背後有廣泛的協力廠商網絡；而馬來西亞及泰國依賴跨國企業投資，儘管在招商時有規定合資比例、技術移轉與在地生產比例，跨國企業運作與在地企業自主技術發展的關係較小，對於經濟的升級幫助不大（Cherif and Hasanov 2015）。另外兩組國家也都有採行進口替代以及鼓勵產業升級政策，以發展資本密集產業，例如馬來西亞發展汽車工業，泰國發展重化工業，但都不具有國際競爭力（Petri 1997）。究其原因，首先，東南亞國家比較普遍存在侍從關係，限制了官僚獨立決策與對企業問責的能力（Lauridsen 2008）。其次，如前一節所述，因為教育投入不夠，人力資源不足。最後，Doner（2009）指出，東南亞國家的發展模式以外資為主體，以產品組裝為主，一直難進行零組件的進口替代，主要的原因是其國家面臨的安全威脅低以及自然資源豐富，使得國家推動產業升級的決心不是那麼強。東南亞的例子，很大程度說明，採取類似的工業政策，在缺乏發展決心，以及相應的人力資源、法治與官僚品質下，促進產業升級的成效並不一樣。

## 五、發展型國家的轉型

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在2000年之後逐漸出現退潮，有好幾項影響因素。首先是過度緊密的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有道德風險存在，易產生投資的浪費與經濟危機。其次則是金融改革，包括利率自由化與銀行私有化，降低了國家可以利用的政策工具。此外，策略性工業獎勵範圍的減少，也降低了官僚的裁

---

<sup>7</sup> 另外，在族群分歧的國家，例如馬來西亞，政府在幾個族群間常無法公平對待，工業政策的選擇不一定是投入最有潛力的企業，而會偏向某一族群。這與韓國的補貼是投入那些最有潛力的產業，相當不同（Chang and Zach 2019）。

量空間。另外則是企業自身的成長，可以自行在資本市場取得資金，不需要再依靠國家的資金分配。加上東亞金融危機的發生，需要國際協助，在國際貨幣基金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的改革要求下，逐漸走向經濟自由化的道路。另外，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下，WTO所推動的貿易協定比以往的貿易協議涉及更多的層面，驅使很多國家進行經濟自由化改革（Manger and Shadlen 2015）。這些發展限縮了政府使用貿易、工業與金融政策的能力（Wong 2005; Lin and Chang 2009）。另外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削弱了執政者對於官僚的保護能力，甚至爲了選票，驅使官僚選擇短線與浪費的政策。

對於發展型國家可能負面影響的調整建議，首先是強化政府治理，例如Weiss（2003）指出應去除依恃關係的存在，Wong（2004；2005）認爲需增加對政府的問責、政府決策的透明以及強化法治。其次則是在政策選擇中更強調市場的角色，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韓國開始減少工業政策的使用，首先是功能別取代產業別的獎勵，之後更是只保留研發獎勵（Chang 1998）。Chen（2014）比較台灣與南韓，南韓更積極推動市場導向的改革，首先，政府工業政策的目的是不是挑選工業種類，而是進行功能別的獎勵，不像台灣在2010年代初期還有對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與面板產業的扶植政策，其次，韓國在金融市場自由化與銀行私有化方面也進行的比較徹底。近年來韓國政府在培育新興產業的任務中，也認爲鬆綁與修改法規是其中的關鍵（KBS World 2020）。

一個常被問到的問題是在全球化與自由化的國際體系中，國家是否還是有干預的角色可以扮演。對此，首先要指出，在東亞國家幾項重要的產業政策持續存在。從1950年代至今，台灣與南韓政府持續的設定產業發展目標，並制定各種政策，來扶持具有潛力的產業。其中多年期的經建發展綜合計畫，雖然從韓國金大中總統開始已經不存在，但是在台灣，至今依舊持續制定多年期經建計畫，配合總統任期不斷更新，規劃產業發展方向、人才培育與引進以及重要的基礎建設計畫等。近年來東亞各國減少干預市場，轉而提供企業研發以及中小企業運作上的協助（Chu 2016; Hsieh, Michelle F. 2016）。在台灣，許多既有發展型國家的產業政策如產業創新條例、科學園區的設立與稅捐優惠，以及工研院等技術研發機構，都是從民主化之前延續至今，只是內容略有更動，



減少對市場的直接干預。這其中許多相應的部分在韓國也同樣存在。歐洲已開發國家也類似，如瑞典政府也積極鼓勵研發，以促進產業的升級，以總理為核心，協調企業、政府、大學來投入與合作（Aiginger, Karl, and Dani Rodrik 2020）。此外，邁入全球化時期，並不代表貿易障礙已經被去除，籌組或加入自由貿易區，以及與其他國家簽訂貿易協定，成為政府協助企業發展的重要任務。例如邱奕宏（2016）與葛永光、陳蒿堯（2016）分別討論日本與韓國政府如何推動貿易協定，來協助企業擴展。不過新的階段也有新的挑戰出現。隨者全球暖化，降低碳排放成為關鍵，為了達成永續的目標，台灣與南韓政府選定綠能產業，鼓勵研發與投資，Wade（2018）認為這是發展型國家的新角色。

其次，因為國家安全的顧慮，要確保企業的發展不會影響到國安，這在台灣一直都相當重要，例如1970年代技術官僚建議商務人士免簽證來台，但因為保防的顧慮被否決，不過此時兩者的矛盾還比較小。這時發展國家的職能，主要是促進企業擴大全球的競爭力與營收，投資來源與銷售市場來自與自己在政治上友好的大國，兩者沒有扞格之處。1990年代之後中國的崛起，讓這個問題開始突顯，因為生產基地與銷售市場都落在政治上的敵對大國。此時企業的生產決定與國家安全產生了矛盾之處。這使得台灣的企業與執政者之間出現拉鋸。對此有兩個不同的觀點，一派是擔心投資中國會淘空台灣產業，台灣產業去了就不會回來了，且可能會出現以商逼政，所以反對以中國為腹地（李登輝，張炎憲 2008）。政府鼓勵企業與民間強化與其他區域的關係，特別是東南亞與印度的廣泛合作。另一派是認為台灣的腹地不夠大，企業要發展就必須要利用中國的腹地，使產業規模可以擴大。Fuller（2018）指出，馬英九政府時期的工業政策主要是透過貿易協定，利用中國大陸的市場來擴大台灣的產業規模並進行升級，但是因為國內的反對與中國自身的產業升級，相關政策最後並沒有產生太多實質的影響。陳添枝（2022）則指出，電子代工業透過中國為腹地，即使毛利低，還是可以取得夠大的資金規模，進而從事研發，使技術升級。另外，對生產關鍵零組件的企業來說，有這個腹地，就有了練兵的機會，如生產晶片的聯發科可以逐漸壯大。近年來，在地緣對抗的格局下，強調本土生產，會如何影響各國的產業政策，未來值得更多討論。

## 參、市場制度

### 一、台灣與東亞國家的經驗

如前所述，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另一部分的角色，是提供市場制度。既有發展國家論的主要論點著重在工業政策，來協助產業的發展，對經濟自由化政策的探討較少，或常以經濟發展的另一種選項視之。但成功的工業政策必須較貼近市場機制，這代表必須有相應的自由市場制度的建立，例如出口擴張工業化須有降低關稅與減稅的措施，以及鼓勵私有企業發展的政策。學者也指出，工業政策的成功有賴於法治、教育、金融制度與基礎建設等條件的配合，只有國家介入資源分配，但是缺乏這些條件，效果會打折（Lin and Chang 2009）。市場這部分在經濟學的領域中討論比較多，認為東亞國家經濟之所以能夠發展，是因為自由市場制度的建立，也就是國家對市場管制的放鬆。工業政策的存在，自然也代表自由市場存在一些限制，長期來說，東亞國家政府的干預逐漸減少，更依賴市場訊號來運作，趨勢是金融、貿易、信貸等市場的自由化（Krueger 1995）。

文獻中比較少談到的是，對許多技術官僚來說，工業政策與經濟自由化兩者對發展都是重要的，並交互使用這兩項政策。以台灣的經驗來說，兩類政策都涵蓋在多年期的經建計畫中，由同一批官僚在推動。他們了解市場干預的無效率，推動減少干預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工作。雖然在產業發展初期的因市場發展的侷限而介入資金與外匯的分配，但他們也瞭解應該要逐步減少對市場的干預。歷經二次大戰與國共內戰的高度政府管制，尹仲容相信私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恢復市場價格機能是經濟正常運作的關鍵，且應從輕工業開始發展，逐步尋求產業升級（李國鼎 1963）。尹仲容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必須走向自由開放之路，他篤信經濟能夠發展的基礎是市場價格機制能夠發揮，主張進行全面性的經濟政策與制度的改革（王作榮 1964）。李國鼎（1993）與葉萬安（2020）的著作中也都提到，台灣經濟發展的歷程其實是一個經濟自由化的進程，透過這個過程才能將生產力釋放出來。孫震（2003）也總結台灣過去五十年的經濟政策，認為就是漸進的經濟自由化。比較具有標誌性的有

1960年代的外貿改革，1970年代的稅務改革，1980年代的自由化與國際化改革，減少利用外匯與利率等政策來影響企業的決策。對於技術官僚來說，產業政策與經濟自由化政策都是發展經濟政策的重要部分，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都是政府要處理的問題。<sup>8</sup>另外在有些技術官僚的定義中，政府的產業政策同時包括處理市場失靈以及維持市場的競爭性，前者的重心即包括產業扶植與調整，後者則是經濟自由化與防止壟斷（蕭峰雄 1994）。

台灣技術官僚這種經濟自由化的想法在二次戰後初期的後進國家中是相當稀有的。東北亞國家政府在引領經濟的表現上，以往的討論主要是從結果來論，以其取得很好的經濟發展成績來評斷。Irwin（2021）則提出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即政策的突破性。在經濟後進國家中，在面對同樣外匯收支不平衡的發展困境時，因為沒有成功的前例可循，改革面對很大的不確定性與可能的失敗，台灣做為當時後進國家中第一個願意推動貿易改革的國家，有其創新性。Irwin（2021）指出尹仲容在接受由蔣碩傑介紹的修正的自由經濟理論（Meade 1949）之後，推動匯率簡化與貨幣貶值，以及進出口稅務簡化方面的改革，放棄進口替代政策，改採出口擴張政策，是創新的政策作為。蔣碩傑、吳榮義（1984）歸納東亞四小龍的發展經驗，台灣除了在四小龍中率先走向貿易自由化之外，另外兩個重點是拉高利率，以鼓勵儲蓄與抑制通膨，以及減稅，以鼓勵投資，這幾項政策基本上也得到其他幾個國家的模仿。

在東亞的幾個國家中，工業政策與經濟自由化，在不同階段也都是日本技術官僚用來發展經濟的政策工具。早期在追趕時期著重工業扶植政策，1990年之後著重技術研發，技術官僚開始規劃推動結構性改革，也就是經濟自由化措施，以此來推動日本下一階段的成長（Okazaki 2017）。韓國負責經濟規劃的經濟企劃院（Economic Planning Board）官僚主要也是偏向市場經濟，但其角色因為執政者的偏好而有差異，比較偏好自由市場經濟的官僚，在開始推動重化工業之後被冷凍，1980年代開始才又重新被重用（Park 2018）。當然，不同部會也有不同的偏好，例如印尼的財政部會官僚比較重視總體經濟穩定與

<sup>8</sup> 在此之前，資源委員會掌握與調度所有重要經濟資源，使市場價格機制無法發揮，對技術官僚來說，是政府失靈的重要教訓。

經濟自由化，工業部會比較重視保護與獎勵工業發展（戴萬平2016）。

相對於台灣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工業政策主要以財稅工具來獎勵具潛力的產業，南韓1970年開始推動重化工業後，工業政策直接以政府控制的資金扶植少數大型企業，政府對於市場的介入比起台灣來得深（Lauridsen 2008）。1980年代之後，兩地都陸續進行經濟自由化的改革，包括外匯自由化、利率自由化，以及公營企業與銀行民營化。但至今台灣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包括國營企業、官股銀行、股市與能源價格等，政府介入市場的程度在許多方面高於韓國。兩地經濟自由化軌跡的長期演變，未來可以有更多的深入分析。

## 二、制度性影響因素

本節回顧影響政府支持經濟自由化改革的制度因素，特別是與產業發展相關的部分。首先，在政體類型方面，學者認為民主體制因為有問責機制，相較來說比較容易出現經濟自由化（Giuliano, Mishra, and Spilimbergo 2013; Doucouliagos and Ali Ulubaşoğlu 2008）。與此相對，威權體制問責機制不健全，只存在規模小的推舉人團（*selectorate*），因此依賴提供私有財來鞏固支持，這涉及競租。經濟自由化會減少競租，因此威權政體較難推動經改（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Steinberg和Malhotra（2014）檢視威權政體的次類型是否影響匯率制度與匯率，發現軍政府獨裁與君主獨裁因為擁有較小的推舉人團規模，會採取固定匯率制度，而君主獨裁與文官獨裁因為有較高的任期安全性，因此會傾向低估匯率，以鼓勵出口。

其次，威權體制擔心自由市場會培育出獨立於國家的勢力，因此需確保對社會力量的控制（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前文已經提過，威權政體對於私人部門壯大的擔心，常常加以限制。此外研究也指出威權體制對金融體系有較多的限制（Eichengreen and Leblang 2008; Giuliano, Mishra, and Spilimbergo 2013）。威權體制中統治者對於執行控制社會的機構，包括軍隊、警察與官僚，以及黨政菁英，會給與一些特權與利益，這之中包括金融融資等（Haber and Perotti 2008）。其次，Cheng（1993）、與Shih（2020）均指出，威權體制擔心金融自由化會創造出一個獨立於國家的階級，因此不支持

金融自由化。不過經濟發展可強化統治正當性，所以威權體制也有誘因進行經改。首先，貿易自由化可促進後發國家勞力密集產業的發展，進而提升社會大眾的生活水準，所以威權國家有意願推動貿易改革，因為這有利於威權的存續（Chang and Wu 2016）。

民主與威權體制也可以從否決者的角度切入來討論。相較於民主政體存在制衡機制，面臨眾多否決者的情境，在獨裁政權中，政策制訂者較能克服反對採取行動（Sah 1991）。以台灣的例子來說，威權體制下的民意機構，不管是立法院或是監察院，很大程度也代表一些既得利益，或擔心改革結果的不確定性，因而反對經濟自由化改革。威權統治者若接受市場機制的理念，憑自身威望，促使立法部門支持行政部門，則可以幫助推動相關改革。例如1950年代的調高電價案，受到立法院反對，總統介入之後才得以通過（蘇勝雄 2014）。葉萬安也回憶1960年初，19點財經計畫的立法過程中，其中一樣改革是將電費等公用事業費率的審議權，從立法院同意移轉到行政院下設的公用事業費率委員會，依照預設的公式來決定，起先也遭遇立法院的反對，也是總統介入才得以施行（陳立文等 2013）。另外如獎勵投資條例的通過，同樣也是層峰的介入才得以獲得立法院的支持（陳立文等 2013）。<sup>9</sup>此外，如放棄進口替代走向出口導向的發展途徑，加工出口區的設立都面臨政府財經部門間或立法院的反對，反對的理由包括對出口沒有信心，擔心會影響政府的財政與造成總體經濟的不穩定（郭岱君2014）。<sup>10</sup>

但如Bueno De Mesquita等人（2003）指出，威權體制中雖然沒有制度性的否決者，但仍存在可以影響統治者存續的推舉人團，統治者必須顧及他們的利益。台灣經驗顯示，若經濟自由化政策會影響核心支持者的利益或影響統治基礎，則威權時期的統治者並不會給予支持。例如很多19點財經計畫列出的改革計畫中，去除進口商品關稅，取消軍公教群體的能源補貼影響核心支持者的利益，國營事業民營化擔心影響統治基礎，並未獲得落實（康綠島 1993；劉玉

<sup>9</sup> 此外，如土地改革，同樣面臨地主及其代表的民意代表反對，也是威權統治者施壓，才能使法案通過（瞿宛文 2017, 219）。

<sup>10</sup> 因為擔心幣值的穩定以及政府收入的減少，經濟與財政部門間對鼓勵出口政策中的減稅，包括進口品減稅以及出口退稅，看法並不相同。

珍 1995；郭岱君 2015）。Hill（2013）以民主轉型為觀察，指出印尼與菲律賓民主化後，因為否決者增加，所以改革的困難度增加，速度變慢，不過反過來說，在民主體制中，一旦已經獲得多數民意的支持，改革就可以很穩定的推行下去。最後，不管是民主或威權體制，當企業集團力量強大時，都可能會形成實質上的否決者，而阻撓改革。例如1980年代泰國的官僚認為，要發展經濟必須推動經濟自由化且推動出口擴張，放棄進口替代，打破大財閥在內需產業的壟斷，但是這些主張並未得到充分的政治支持。在民主化之後企業主搖身變為議員或內閣部長，繼續維持依恃網絡，阻止經濟自由化（Phongpaichit and Baker 1999）。

威權體制是否願意克服否決者的壓力，也受到執政者意識形態的偏好，若經濟自由化政策違反執政黨尊奉之核心意識形態，則不容易進行。以台灣為例，國民黨原先抱持三民主義，主張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採取經濟自由化的改革在開始時受到黨內的反對，遭受立法院的攻擊，或者是監察院的彈劾，技術官僚必須與之辯論，嘗試說服保守派（郭岱君 2015）。部分財經官僚與國民黨黨部反對民營化，除了認為與孫中山的理念不合，也擔心過強的私營企業會影響國民黨的生存基礎（郭岱君 2015）。政黨意識形態的轉向背後，當然有執政者的支持，統治者本身的意識型態與技術官僚是否一致，會影響相關政策的推動。蔣中正比較偏向尊重技術官僚及其支持的市場機制。但蔣經國則比較偏向社會主義，對市場機制有所保留，認為重要物資的價格不應該完全聽憑市場，反對公營銀行民營化，並喜好同時推動數項大型基礎建設與重化工業投資來促進經濟成長（李國鼎 1963；康綠島 1993；王作榮 2002；孫震 2003），這些主張都帶有民粹的性質，與技術官僚之間不時會出現意見不一致的情形。<sup>11</sup>基本物資補貼與大型公共建設這兩個偏好在民主化後的政府也一直延續下來，在選票的考量下，更不可能改變。李登輝認為對市場政府不需要有太多的干預，對於財經政策與大型公共建設基本上尊重技術官僚的規劃，但是在兩岸議題上則與技術官僚出現分歧（李登輝、張炎憲 2008）。

<sup>11</sup> 1980年代之後台灣出超與外匯收支不平衡問題日益嚴重，技術官僚開始獲得執政者支持，推動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改革（Cheng, Haggard and Kang 1998）。

韓國的情形也有類似之處，主要負責經濟政策規劃的經濟企劃院官僚偏好較多市場機制，減少國家工業政策的介入程度，但是其影響力受到執政者偏好的影響。在1970年代的重化工業推動之前，韓國的工業政策與台灣類似，以出口扶植為重心，並未鎖定特定產業。開始推動重化工業後，朴正熙總統跳過偏向市場經濟的經濟官僚部門，另創一個機構來執行，1970年代末期，經濟企劃院才又受到重視（Cheng, Haggard, and Kang 1998）。因應1970年代國家扶植重化工業造成的浪費與總體經濟的不穩定，以及全球化的挑戰，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全斗煥總統決定改弦易轍，走向經濟自由化的道路，開始減少工業政策的使用、減少干預市場與進行民營化措施，甚至裁撤經濟企劃院。東亞金融風暴後，進一步加大自由化的改革（Kim and Leipziger 1997; Park 2018; Chang and Zach 2019）。所以傳統認為典型的發展型國家中，統治者提供技術官僚保障，尊重其決定，在扶植工業發展方面大致是對的，在經濟自由化這部分則不完全是這樣。

最後，近年來許多研究開始討論政黨制度化對經濟政策的影響。Bizzarro等人（2018）指出，一個制度化的政黨存續比較久，政黨領導人比較會進行長線的思考，此外，政黨有比較完整的社會連結，所以領導人不會只考量少數群體的利益，比較會從社會整體利益思考之，因此會採取保護財產權政策，避免制定掠奪式政策。Hankla（2006）也指出，低制度化的政黨體系下，也就是政黨的得票變動率大的國家中，政黨不易推動那些對社會整體有益但需要比較長時間才會看見效果的政策，因此不傾向推動貿易自由化。政黨制度化對經濟政策的影響，除了發生在民主體制，也會發生在威權體制，威權體制缺少問責機制，制度化的政黨對於制約統治者的誘因來說特別重要。Charron和Lapuente（2011）發現，一黨獨大政權因為社會基礎廣泛，政府比較會回應社會各種需求與聲音，會提供較多的財產權與契約保障以及建立有效率的官僚。Bizzarro等人（2018）指出，政黨制度化程度高是威權體制下台灣經濟發展表現優異背後的重要因素。

影響政府推動經濟自由化改革的因素，自然也有歷史、國際與社會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例如放棄進口替代策略，往出口導向的方向發展，涉及貿易自由化改革，這部分前文已經提過，與一國面對的外在威脅以及自然資源豐沛有

關。經濟自由化改革政策事實上是出口擴張產業政策的重要一環，所以影響兩種政策的結構性因素很大部分也是重疊的，這裡不再贅述。另一方面，制度因素如官僚品質與政權類型等也會影響工業政策，這已如前述。另外如政黨制度化也會影響工業政策，政黨制度化高的國家，政黨比較可能採取長線的思考，願意放棄進口替代策略，往出口導向發展。相反的，Lauridsen（2008）以泰國的例子指出，政黨體系分散使得產業政策只是在分配資源給政治人物選區的產業，而不是在促進產業升級。

## 肆、重分配政策

### 一、東亞發展型福利資本主義

東亞發展型國家以發展經濟目標，主張先犧牲短期的消費換取未來的成長，將餅做大之後，再處理分配的問題。Holliday（2000）與Gough（2004）以發展型福利資本主義（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來稱之。在這些國家中社會福利政策是經濟發展政策的一部分，目的除了促進社會穩定，也在確保有充足與優質的勞動力供給。其特色主要是國家優先提供醫療與教育支出等有助經濟成長的項目，對一般普遍性社會福利照顧方案支出有限；其次是針對從事生產活動的勞工提供福利，而不是對所有國民提供照顧；最後是勞工的保障中，企業與家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Holliday 2000；Aspalter 2006；Aspalter 2017；Hwang 2011）。不過與世界上的幾種福利模式相比較，歐陸如德國的模式，福利的領取資格也是與職業連結在一起，而不是與公民身份綁在一起，且不同職業間也有顯著的差異，不同職業與所得群體間的重分配程度低（Manow 2021）。此外，推動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在協助社會穩定與經濟成長，以及福利的領取資格是與職業連結在一起（Aspalter 2017）。所以東亞國家的福利制度其實和歐陸國家的模式，在某些面向上有相似之處（Fleckenstein and Lee 2017; Aspalter 2017）。

東亞特色福利國家出現的一個原因是這些國家的經濟依賴出口，充分整合入國際經濟體系，因此對於人力在內的生產成本高度敏感，要維持國際競爭



力，必須避免提供過高的勞工福利（Rudra 2007）。東亞發展型福利資本主義的存在另有三個制度性的條件。首先，威權體制的存在，壓制了勞工與市民社會鼓吹改善勞工福利的聲音，強調犧牲短期的消費，換取長期經濟的發展。這形成了一種社會契約，即快速的經濟發展伴隨所得的提高與相對均等的所得分配，人民願意繼續支持這樣的有限福利體制以及背後的威權體制。另外，幾個民主化後的東亞國家缺乏強有力的左派政黨與工會力量也是重要的因素（Peng and Wong 2010）。最後，東亞重視家庭，所以一直以來認為福利照顧可以在家庭或親族間進行，不需太多政府介入（Peng and Wong 2010）。

威權統治者爲了減緩社會追求民主化的壓力，也會制訂保障勞工的社會福利政策。台灣解嚴之前，有鑑於1980年代初期的立委增額選舉中勞工選票表現不佳，1984年國民黨政府制訂通過勞動基準法，保障勞工的權益。韓國民主化前一個常被忽略的政經安排是威權體制下國家對一些社會安全保障的制訂（Mkandawire and Yi 2014）。所以威權政府是有提供社會福利照顧，不過比較偏向對勞工的照顧，而不是普遍式的照顧。

近年來東亞國家面對分配的問題，也必須處理社會安全的議題，以穩固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Chu 2016; Hsieh 2016）。此外，隨著民主化的發展，許多國家開始提供更多普遍式的社會安全保障（Aspalter 2006; Fleckenstein and Lee 2017）。Peng and Wong（2010）指出，東北亞國家發展出一個比較包含式的社會保險架構，不具生產力的群體也逐漸獲得社會保障，而香港、新加坡與中國則仍停留在個人式以及市場爲基礎的福利架構。Peng and Wong（2010）也指出，因爲東北亞國家的所得分配相對均等，推動普遍式社會保障的政治與經濟成本較低，所以這些國家願意加以推動。民主化後台灣與南韓修正以往經濟發展優先的政策，採取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的發展策略，提高對勞工的保障與普遍式的社會照顧（Wong 2004; Hwang 2011; Suh and Kwon 2014）。在1990年代，兩地都制訂或強化了失業保險、國民年金與全民健康保險等措施（Wong 2004）。與此相較，一些東亞國家在政治體制上仍然維持一黨的專政，例如中國、越南與新加坡，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於經濟成長的關注較高，在許多社會與勞工政策上的進展相對緩慢（Wong 2014; Ukhova 2015; Rahim and Yeoh 2019; 吳親恩、練曄妍 2022）。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政黨的角色。Fleckenstein和Lee（2017）指出台灣與南韓在民主化之後，威權時期的保守政黨繼續執政，爲了吸引選票，民主化後初期的社會福利擴張主要是在這些政黨任內推動的。但之後都經歷了政黨輪替，反對黨倡議福利國家的建立，強化了普遍性社會保障的推動。不過Fleckenstein和Lee也承認，保守政黨重新上台之後也開始接受普遍式的社福政策，以擴大選舉基礎。另一個面向是政黨的制度化，研究發現薄弱的政黨制度化會導致社會福利的水準較低，因爲政黨在此情形下無法有效進行討價還價和鞏固黨內外的支持（Rasmussen and Knutsen 2021）。一直以來韓國政治的一個標誌性特徵是政黨之間頻繁的分裂和合併，由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主導的反覆政黨重組。這造成政策頻繁轉換和政黨在許多勞工問題上立場游移，政黨無法將社會分歧轉換成具體的政策（Lee 2009；Lee 2015）。與此相對，在威權時代台灣如韓國一樣透過國家控制的工會來管控勞工運動，但同時也允許勞工代表獲得一些政治代表，讓其聲音可以反應在政策上。民主化後台灣形成兩黨制，政黨制度化程度較高，較能反應勞工的需求（Buchanan and Nicholls 2003；Lee 2011）。

近年來收入不平等問題惡化，也成爲國家在提升經濟發展的阻礙。首先在教育與發展機會方面，如同前述，產業發展的重要社會基礎是充沛與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但當一個國家陷於所得分配嚴重不均時，許多人的教育機會受限，高素質的勞動力這個條件將難以達成。此外，財富集中，使得在既有企業集團之外，要浮現新興的企業家變得困難，而使產業發展受限。反過來說，產業發展也是社會安全保障強化的一個重要基礎。拉美國家採取進口替代政策時，都市勞工獲得良好的福利照顧，但是對其他社會群體的照顧就無力顧及。做爲社會民主主義典範的歐洲國家如瑞典，認爲福利國家的建立與持續必須依賴持續的研發，來促進產業的升級，而這有賴企業、政府與大學的投入（Aiginger and Rodrik 2020）。Nishijima（2012）指出日本工業政策中，對於中小企業的政策照顧比大企業更多，對於強化中小企業的競爭力及維護社會穩定有重要的貢獻。工業政策對所得分配及福利政策間的關係，值得更多討論。另外，黃富娟（2020）指出，近年來拉美國家的左派政權，在發展模式上提出參與式民主和經濟民主化，例如增加國有化與社會生產企業，期望能修正自

由市場經濟的所得分配不均問題。當然實踐上這些新模式的成效往往並不如預期。

## 二、民衆對重分配政策的態度

包含台灣在內的許多東亞國家，都曾在威權統治之下經歷經濟快速發展且收入較為平等的時期，但是近年來也出現收入不平等逐漸升高的問題（Park and Uslander 2021）。從總體數據來看，Huang和Ku（2011）指出台灣在社會福利上的支出低於同為東亞國家的韓國與日本，也同樣低於OECD國家。除此之外，許多研究也都指出台灣在民主化之後，收入不平等的情況也慢慢的惡化（張傳賢 2014; Park and Uslander 2021）。社會福利政策也是在選舉中被重視的一個議題（黃德福、謝俊義、劉嘉薇 2010）。

Hsieh（2005）在其研究中認為，在台灣最重要的社會分歧從過去的本省人與外省人的衝突演變成國家認同議題，這樣的政治分歧影響到政黨體系與民衆的政黨認同，在這當中，Hsieh進一步發現到不支持政府推動社會福利的受訪者，傾向不支持泛綠的政黨。張傳賢（2014）提到2012年總統選舉中，蔡英文以縮小貧富差距與公平課稅等政策作為競選的主軸，以致藍綠在重分配議題上呈現明顯的差距，而民進黨這樣以重分配議題為選戰主軸的情況其實在1995年的立法委員選舉就出現了（林佳龍 2000）；反過來說，國民黨在政黨形象上讓人認為不是一個支持重分配的政黨（游清鑫 2002）。因此，對於台灣民衆而言，是否支持重分配政策或是支持的程度的高低，有很大一部分是與政黨認同密切相關的。

張傳賢（2014）除了說明政黨認同對重分配立場有影響外，也發現雖然家戶收入對於是否支持縮小貧富差距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是收入較高的受訪者，會對經濟的未來抱持樂觀的看法，也間接的影響了對縮小貧富差距政策的支持。之外，該論文也將兩岸經貿議題納入討論，例如是否曾赴中國大陸經商或者是陸客來台的影響。結果發現因為兩岸經貿交流而對未來經濟越樂觀的人，比較不支持重分配的政策，因為這一群人預期未來國家與個人的所得會增加，重分配可能會傷害未來可能得到的利益。目前兩岸經貿的官方交流並不如2012年密切，蔡英文推行的南向政策與抗中友美政策，是否會改變台灣民衆

對於重分配政策的偏好，是未來很值得觀察與研究的議題。

除了上述的政治性因素之外，其他可能會影響台灣民眾重分配態度的因素還包括了民主制度的評價、世代的差異、對於收入與機會不平等的評估等等。例如Kim et al. (2018) 針對中國、日本、韓國與台灣的研究，發現受訪者對不平等的評估會影響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其中包含對不平等的評估與對機會不平等的評估，當受訪者覺得越不平等，那麼越傾向於支持政府減少貧富之間的差距。

Yeh和Ku (2020) 控制受訪者的政黨認同，發現台灣民眾對於不平等的評估會先影響民主滿意，再進一步影響對於重分配的支持，因為民眾認知到一個良好的民主治理，是可以提供社會支出來滿足民眾的需求並緩和不平等，如果民主體制表現得不好，會讓民眾質疑公共支出是否有被合理的使用。陳怡如 (2018) 也有類似的結論，其認為對於民主制度的支持是台灣民眾支持社會福利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當民眾越支持民主體制，那麼就會越支持重分配的政策。這樣從民主滿意度與民主支持的角度來討論民眾對於重分配的偏好，某種程度上也回應了Acemoglu和Robinson (2005) 的論點，那就是民眾認知到民主制度是會做重分配並的政治體制。因此，一個國家如果能夠強化民主問責與民主深化，就可增加民主滿意度與民主支持度，也有利建立更好的社會保障制度。

### 三、對於民主支持的影響

Acemoglu以及Robinson (2005) 認為當收入不平等升高時，在威權體制之下，政治人物承諾制定財富重分配政策，但是這樣的承諾是無法被人們所信任，因此窮人傾向於支持民主體制。從實證來看，民主國家是否能夠減少收入不平等，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 (Timmons 2010)。在經濟比較開放的民主國家當中，收入比較平等 (Reuveny and Li 2003)；還有當民主轉型之前收入是高度不平等的國家，轉型後會減低不平等的程度 (Dorsch and Maarek 2019)。

對於民主制度評價的研究，首先，Son (2016) 針對南韓民眾做研究，發現到窮人在國家經濟狀況不好的時候比較不支持民主體制。這是因為窮人們認

為民主體制是財富重分配的工具，所以當國家經濟狀況不好會使得財富重分配機會減少，因而比較不支持民主體制，這樣的研究發現其實某種程度上回應了分配衝突理論在民主化理論上的假設。在針對東亞國家的跨國研究中，吳親恩（2009）指出，雖然收入不平等相關指標沒直接影響民主支持程度，但是會透過民主滿意度間接影響民主支持，因為收入不平等到相關指標都顯示其會降低民衆的民主滿意度。另外，Kriekhaus et al.（2014）針對40個民主國家的研究發現收入不平等會減少民主支持，這樣的現象橫跨所有的社會階級。不過，他們也同時發現到在高度收入不平等的國家內，窮人們對民主支持的降低程度就沒有那麼嚴重。

Wu和Chang（2019）在其研究中認為吉尼係數等客觀性指標並無法代表民衆對於所得分配的真實想法。因此，Wu和Chang使用亞洲動態民主調查與拉丁美洲民主調查中關於財富分配公平性的問題，來測量民衆對於收入不平等的評估，也同時發現了當受訪者認為財富分配是不公平的，對於民主滿意的程度就會降低。Chu和Wu（2019）針對東亞國家的研究同樣使用主觀性的財富分配評估當作解釋變項，其研究區分政體來分析，發現因為財富分配不平等導致民主滿意度降低這樣的效果，在採用半威權混合政體（hybrid regimes）的國家中比較明顯。因為在民主國家中，例如台灣，民衆可以針對政府的政策做批評或是在選舉中支持反對黨，依此來督促政府調整其施政，這樣的機制在混合政體當中是比較缺乏的。

林奕孜（2021）與Wu和Chang（2019）的研究，同樣使用受訪者評估財富分配公平的問題，依此檢視台灣民衆對民主制度的評價。與過去研究的相似之處是對財富分配不公正的評估，會減少台灣民衆對民主的滿意度，然而認為財富分配是不公平的受訪者，反而會增加對民主的支持程度，不過這樣的現象是會變動的，民衆會先評估過去所得分配的狀況，再思考過去與當下的政治環境與脈絡，最後前瞻性的評估未來在民主制度之下，財富分配的狀況是否會變好。這部分是未來學界可以繼續發展的目標。

以上幾個研究都指向收入不平等會影響到民衆對於民主支持的程度。然而，收入不平等是否與民主倒退有關聯則需要更進一步的檢驗。Houle（2009）的研究認為，當民主國家內的收入不平等惡化時，執政菁英爲了避

免財富被窮人透過民主機制做重新分配，便會透過政變來改變政府體制。不過Houle的理論是從菁英的角度所建構出來的，未來的研究也可以從民衆的角度來討論。

與前一點相關，也可以看威權體制中的情形，對民主化之後重分配的預估也會影響不同階級民衆對民主改革的支持。文獻指出，中高社經地位者在既有威權體制中享有既得利益，擔心民主化後可能的所得重分配，並不一定比較支持民主體制。在許多歐洲與拉美國家的民主化過程中，在替自己爭取到參政權之後，中產階級擔心所得重分配，支持限制勞工取得投票權（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Huber 1992）。吳親恩（2021）討論台灣民主在轉型期時，社經背景與反對陣營支持間的關係，指出解嚴前的立委選舉中，中高社經地位者雖然擁抱較高的民主價值，但是擔心民主變革對政治經濟體制穩定的可能影響，並不支持反對陣營；不過在宣布解嚴之後，不穩定因素消除，中高社經地位者反而成爲最支持反對陣營的群體。與此相對，職業群體方面，因爲處於國家經濟的邊陲位置，自營商與藍領勞工在民主啓動前與後，均偏向支持反對黨。

所得分配與民主支持的關係與發展模式也有關。在東北亞比較成功的案例中，主要是比較趨近市場機制，逐步發展技術層次更複雜但資金需求更高的產業，這樣的發展途徑，較能吸納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使貧富差距維持穩定。但若一國產業升級困難或直接跳到生產重化工業，然後靠保護來延續，常使經濟發展陷入停滯，使得其製造業部門能夠吸納的就業人數有限，農村中仍有龐大的貧窮農業人口。若搭配上民主體制開始施行，所得重分配的聲音與政策增加，但都市與都市邊緣及農村的所得水平差距大，都市中的中產階級對於農村地區的改革需求相當疑懼，當影響到其利益時，甚至願意支持破壞民主體制的行動。這事實上就是近年來泰國政治動盪的經濟背景，其城市中的中產階級在民主轉型前是支持民主體制的，但是民主體制施行與重分配政策增加之後，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開始轉向，進而支持維持穩定的軍事政體（Wu, Lee, and Bandyopadhyay 2021）。這與過往拉丁美洲中產階級面對民粹主義的重分配訴求時，對民主支持產生保留的態度也有類似之處。

## 伍、結論

本文討論與台灣有關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文中討論國家推動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包括贏家扶植以及經濟自由化政策，以及重分配政策。從本文的討論可以知道幾個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首先，以台灣的經驗來說，對於技術官僚來說，贏家扶植以及經濟自由化政策都是發展政策的一環，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技術官僚這樣的思維是否在許多國家都會出現。另外一個議題則是近年來，在地緣對抗的格局下，強調本土生產，出口面臨了關稅以外新的限制，不同國家的對應方式值得加以探討。此外，則是發展國家角色在新時代的可能性，特別是生態惡化下的政府角色，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挑戰，因為經濟發展不同程度都在增加對生態的破壞，如何增加經濟發展，但能逐漸減少對環境的破壞，是前所未有的挑戰。最後，東亞國家之間面臨了程度不等的軍事安全威脅，可以探討這與其他區域國家所面臨的安全威脅及其對經濟政策的影響有何不同。

（收件：111年11月8日，通過：112年4月27日）

#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vestigating the Experiences in Taiwan and the East Asia**

*Chin-En Wu*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Yi-Tzu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 **Abstract**

We review two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discuss how states employ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in the industrial policy framework, we delve into the issues of choosing winners, difference in industrial policy implement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cracy and the rulers, structural factors that affect industrial policy choic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recent years. Secondly, the debates surrounding developmental state center on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mainly view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policies as an alternative option. We shed light on how countries employ these two policies in an interactive manner and proceed to analyze the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reforms. Selecting the potential winners and pushing through economic reforms both face political opposition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pressures confronted by governments when promoting these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se



oppositions can be effectively overcome. Finally, this paper offers an overview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safety net in Taiwan and East Asia. We also discuss when citizens prefer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d how income distribution is associated with popular support for democracy.

**Keywords:** Developmental state, industrial policy,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come redistribution, support for democracy

## 參考文獻

- KBS World, 2020, 《2020韓國產業結構調整》, KBS World, #經濟焦點 1 2020-02-24。KBS World. 2020. “Hankuo chanyeh chiehkou tiaocheng” [2020 Korea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KBS World, Economic Focus 1* (2020-02-24).
- 于宗先、王金利, 2003, 《一隻看得見的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 台北：僑國華文基金會叢書。Yu, Zong-xian and Wang Jin-li. 2003. *Yi zhi kan de jian de shou : zheng fu zai jing ji fa zhan guo cheng zhong de jiao se* [A Visible Hand: Role of Governme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aipei: Yu Kuo-Hwa Foundation.
- 王作榮, 1964, 〈尹仲容先生在經濟方面的想法和作法〉, 《自由中國之工業》, 21 (1) : 1-9。Wang, Tso-jung. 1964. “Yin zhong rong xian sheng zai jing ji fang mian de xiang fa he zuo fa” [Yin Kuo-yong’s Economic Thoughts and Policies]. *Industry of Free China*, 21 (1): 1-9.
- 王作榮, 2002, 〈李國鼎先生在台灣經濟發展中的定位〉, 《李國鼎先生紀念文集》, 臺北：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Wang, Tso-jung. 2002. “Li, Kuo-Ting hsien sheng tsai Taiwan Chingchi fachan chung te tingwei” [Li Kuo-ting’s Positioning i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i, Kuo-Ting hsien sheng chinien wenchi, *Li, Kuo-Ting Memorial Collection*. Taipei: K.T Li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平思寧, 2014, 〈中東北非地區的國內衝突起因之探析：政治與經濟的革命？〉, 《問題與研究》, 53 (3) : 61-86。Ping, Szu-ning. 2014. “Chungtung Peifei tichu te kuonei chungtu chiyin chih tanhsi: chengchih yu chingchi te keming” [The Causes of Civil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Regions]. *Wenti Yu Yanjiu*, 53 (3): 61-86.
- 李國鼎, 1963, 〈台灣經濟發展的領港人〉, 《自由中國之工業》, 19 (2) : 8-10。Li, Kuo-ting. 1963. “Taiwan Chingchi fachan te lingkangjen” [Leaders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y of Free China*, 19 (2): 8-10.

- 李國鼎，1993，《台灣經濟發展背後的政策演變》，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Li, Kuo-ting. 1993. *Taiwan chingchi fachan peihou te chengtse yenpien* [The Policy Evolution Behi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 李登輝、張炎憲，2008，《李登輝總統訪談錄：財經產業》，台北：允晨文化。Li, Teng-hui and Yen-Hsien Chang. 2008. *Li, Teng-Hui tsungtung fangtanlu: Tsaiching Chanyeh*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Lee Teng-Hui: Business, Finance and Industry]. Taipei: Asiangculture.
- 林文斌，2010，〈超越相互依賴和對抗？韓國政府財閥政策變遷的研究〉，《問題與研究》，49（5）：65-105。Lin, Wen-pin. 2010. "Chaoyue hsianghu ilia han tuikang? Hankuo chengfu tsaifa chengtse pienchien te yenchiu" [Beyond Mutual Dependence and Confrontation-Transformations of Korean Government's Chaebol Policy]. *Wenti Yu Yanjiu*, 49 (5): 65-105.
- 林佳龍，2000，〈台灣民主化與政黨體系的變遷：菁英與群眾的選舉連結〉，《台灣政治學刊》，4：3-55。Lin, Chia-lung. 2000. "Taiwan mingchuhua yu chengtang tihsi te pienchien: Chingying yu chungung te hsuanchu lienchieh"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Change of Party System: Electoral Linkage of Elite and Mass].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 3-55.
- 林奕孜，2021，〈臺灣所得分配與民主制度的評價：是異例嗎？〉，《台灣民主季刊》，18（4）：43-74。Lin, Yi-tzu. 2021. "Taiwan sote fenpei yu minchu chihtu te pingchia: shih ili m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tic Support in Taiwan: A Deviant].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8 (4): 43-74.
- 邱奕宏，2016，〈剖析日本簽訂FTA與加入TPP的政策制定過程〉，《問題與研究》，55（3）：41-80。Chiou, Yi-hung. 2016. "Pouhsi Jihpen chienting FTA yu chiaju TPP te chengtse chihting kuocheng" [Analysis of Japan's FTA Evolution and Policy-Making Process on Entry into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Wenti Yu Yanjiu*, 55 (3): 41-80.
- 吳親恩，2009，〈經濟議題與民主體制評價—東亞國家的觀察〉，《台灣民主季刊》，6（1）：1-39。Wu, Chin-en. 2009. "Chingchi iti yu minchu tichih

- pingchia-Tungya kuochia te kuancha” [Economic Issues and the Evaluation of Democracy: An Observation from East Asia].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6 (1): 1-39.
- 吳親恩，2021，〈社經背景、投票選擇與對民主改革之支持度—民主轉型期立委選舉之觀察〉，《臺灣民主季刊》，18（4）：1-42。Wu, Chin-en. 2021. “Sheching peiching, toupiao hsuantse yu tui minchu kaike chih chihchihtu-minchu chuanhsingchi liwei hsuanchu chih kuancha”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Vote Choice, and Support for Democratic Reform: A Study of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s during Democratic Transition].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8 (4): 1-42.
- 吳親恩、練曄妍，2022，〈香港最低工資政策：發展型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向？〉，《政治學報》，74：65-106。Wu, Chin-en and Wai-In Lin. 2022. “Hsiangkang tsuiti kungtzu chengtse: fachan hsing fuli tzupen chui te chuanhsiang” [Minimum Wage Policy in Hong Kong: A Shift in Developmental Welfare Capitalism].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 65-106.
- 洪紹洋，2020，〈產業政策與企業經營：1950-1970 年代臺灣汽車工業的發展〉，《臺灣史研究》，27（4）：137-176。Hung, Shao-yang. 2020. “Chanyeh chengtse yu chiyeh chingying” [Industrial Polic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Industry in Taiwan (1950-1970)]. *Taiwan History Studies*, 27 (4): 137-176.
- 孫震，2003，〈臺灣經濟自由化的歷程〉，台北：三民書局。Sun, Chen. 2003. *Taiwan chingchi tzuyuhua te licheng* [The History of Taiwan's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aipei: Sanmin.
- 康綠島，1993，〈李國鼎口述歷史：話說台灣經驗〉，臺北：卓越文化。Kang, Lu-tao. 1993. *Li, Kuo-Ting koushu lishih: hua shuo Taiwan chingyen* [Li, Kuo-Ting's Oral History: Talking about the Taiwan Experience]. Taipei: Excellence.
- 許增如，2019，〈邁向半導體產業王國之路—以臺灣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歷程（1974-2018年）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Hsu, Tseng-ju. 2019. *Maihsiang pantaoti chanyeh wangkuo chih lu-I Taiwan chiti tienlu chanyeh fachan lichen (1974-2018) wei li* [Taiwan's Rise as a Semiconductor Powerhouse: Interpreting Taiwan's IC Industry History through 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 (1974 to 2018)]. Taipei: Ph. D. diss., Graduat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陳立文等，2013，〈葉萬安訪談錄〉，《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臺北市：國史館。Chen, Li-wen teng. 2013. "Yen, Wan-An fangtanlu." [Interview with Wan-An Yeh]. In Yen, Chia-Kan eds., "*tsungtung hsingi fangtanlu*" [President Yen, Chia-Kan's Life], Taipei: Academia Historica.
- 陳怡如，2018，〈影響台灣民衆支持社會福利的因素－明確二分集合的分析〉，《臺灣民主季刊》，15（2）：101-145。Chen, I-ru. 2018. "Ying xiang taiwan min zhong zhi chi she hui fu lidayin su-ming qur er fen ji he de fen xi" [Factors Affecting People's Support for Social Welfare in Taiwan-Analysis of Explicit Dichotomous Sets].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5 (2): 104-145.
- 陳添枝，2022，《越過中度所得陷阱的台灣經濟1990~2020》，臺北市：天下文化出版社。Chen, Tien-chih. 2022. *Yuehkuo chunhtu sote hsienching te Taiwan chingchi* [Taiwan's Economy Beyond the Middle Income Trap 1990 - 2020]. Taipei: Commonwealth.
- 郭岱君，2014，〈嚴家淦與尹仲容：臺灣經濟改革的關鍵人物〉，吳淑鳳、陳中禹編，《轉型關鍵：嚴家淦先生與臺灣經濟發展》：101-156，臺北市：國史館。Kuo, Tai-chun. 2014. "Yan jia gan yu yin zhong rong : Taiwan jing ji gai ge de guan jian ren wu" [Yen Chia-kan and Yin Kuo-yong: Key persons in Taiwan's Economic Reforms]. In Wu Shu-feng and Chen Zhong-ui, eds., "*zhuan xingguan jianyan jia ganxian shengyutai wanjing ji fa zhan*" [Yen Chia-kan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101-156. Taipei: Academia Historica.
- 郭岱君，2015，《台灣經濟轉型的故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Kuo, Tai-chun. 2015. *Taiwan chingchi Chuanhsing te*

- kushih: tsung chihua chingchi tao shihchang chingchi* [*The Story of Taiwan'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Taipei: Linkingbooks.
- 黃德福、謝俊義、劉嘉薇，2010，〈臺灣民衆政治信任與政策偏好之研究〉。臺北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Huang, Te-fu, Chun-I Hsieh and Chia-Wei Liu. 2010. *Taiwan minchung chengchih hsinjen yu chengtse pienhao chih yenchiu* [*A Study of Political Trust and Policy Preferences in Taiwan*]. Taipei: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 黃富娟，2020，〈安地斯國家替代發展之研究：秘魯、委內瑞拉與厄瓜多的比較〉，《問題與研究》，59（1）：1-54。Huang, Fu-chuan. 2020. “Antissu kuochia titai fachan chih yenchiu: Pilu, Weineijula yu Okuato te pichiao” [Alternative Developments in the Andes Countries: Peru, Venezuela and Ecuador Comparison]. *Wenti Yu Yanjiu*, 59 (1): 1-54.
- 游清鑫，2002，〈21世紀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政黨形象的探索〉，《中國地方自治》，55（8）：19-35。Yu, Ching-hsin. 2002. “21 shihchi Taiwan hsuanmin te chengtang jentung: chengtang hsinghsiang te tanso” [Party Identity of Taiwan Voters in the 21st Century: An Exploration of Party Image].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55 (8): 19-35.
- 張守眞，2001，〈中鋼推手：趙耀東先生口述歷史〉，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Chang, Shou-chen. 2001. *Chungkang tuishou: Chao, Yao-Tung hsiensheng koushu lishih* [*China Steel's Pusher: Oral History of Chao, Yao-Tung*]. Kaohsiung: Kaohsiung Historiography Commission.
- 張文揚、詹捷翔、平思寧，2019，〈民主、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一個混合研究法途徑的分析〉，《政治學報》，67：1-50。Chang, Wen-yang, Chieh-Hsiang Chan and Szu-Ning Ping. 2019. “Minchu, tzujan tzuyuan yu chingchi fachan: Yike hunhe yenchiufa tuching te fenhsi” [Democracy,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Mixed-Method Approach].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 1-50.
- 張傳賢，2014，〈利己或利他：民衆於2012年總統選舉中重分配議題的立

- 場》，《選舉研究》，21（2）：43-80。Chang, Alex C. H.. 2014. “Lii huo lita: minchung yu 2021 nien tsungtung hsuanchu chung chungfenpei iti te lichang” [Egoism or Altruism: Citizens’ Attitude toward Redistribution in the 2012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1 (2): 43-80.
- 葉萬安，2020，《台灣經濟再奮發之路：擷取過去70年發展經驗》，臺北：天下文化。Yen, Wan-an. 2020. *Taiwan chingchi tsai fenfa chih lu: Chienchu kuochu 70 nien fachan chingyen* [The Road to Taiwan’s Economic Redevelopment: Capturing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Past 70 Years]. Taipei: Commonwealth.
- 蕭峰雄，1994，《我國產業政策與產業發展》。臺北：遠東經濟研究顧問社。Hsiao, Feng-hsiung. 1994. *Wokuo chanyeh chengtse yu chanyeh fachan* [Taiwan’s Industrial Polic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aipei: Far Eastern Economic Research Consultants.
- 蔣碩傑、吳榮義合撰、吳惠林譯，1984，《亞洲四條龍的經濟起飛：經濟專論49》，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Chiang, Shuo-chien and Jung-I Wu. 1984. *Yachou ssutiaolung te chingchi chifei: chingchi chuanlun 49* [The Economic Take-off of Asia’s Four Dragons: Economic Monograph 49]. Taipei: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 葛永光、陳蒿堯，2016，〈韓國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戰略之研究〉，《問題與研究》，55（3）：1-40。Ger, Yeong-kuang and Hao-Yao Chen. 2016. “Hankuo yu Meikuo chienting tzuyu maoui hsienting chanlueh chih yenchiu” [South Korea’s FTA Strategy on the 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 *Wenti Yu Yanjiu*, 55 (3): 1-40.
- 劉玉珍，1995，《鐵頭風雲－趙耀東傳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Liu, Yuchen. 1995. *Tientou fengyun - Chao, Yao-Tung chuanchi* [The Iron Head - The Legend of Chao, Yao-Tung]. Taipei: Linkingbooks.
- 戴萬平，2010，〈國家機關與產業發展：馬來西亞與泰國汽車產業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問題與研究》，49（3）：71-103。Tai, Wan-ping. 2010. “Kuochia chikuan yu chanyeh fachan: Malaihsiya yu Taikuo chiche

- chanyeh chengtse te chengchih chingchi fenhsi” [State and Industrial Poli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ics Analysis of Malaysia and Thailand's Automobile Industrial Policies]. *Wenti Yu Yanjiu*, 49 (3): 71-103.
- 戴萬平，2016，〈無科技的工業化:印尼汽車產業發展之政治經濟分析〉，*《問題與研究》*，55（1）：91-121。Tai, Wan-ping. 2016. “Wu kechi te kungyehhua: Yinni chiche chanyeh fachan chih chengchih chingchi fenhsi” [An Industry Without Industrialization: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ailure of Indonesia's Automotive Industry]. *Wenti Yu Yanjiu*, 55 (1): 91-121.
- 瞿宛文，2017，*《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Chu, Wan-wen. 2017. *Taiwan chanhou chingchi fachan te yuanchi: houchin fachan te weiho yu juho* [The Origins of Taiwan's Post-Wa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Why and How of Late Development]. Taipei: Linkingbooks.
- 蘇聖雄，2014，〈蔣中正與遷臺初期之立法院：以電力加價案為核心的討論〉，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129-206。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Su, Sheng-hsiung. 2014. “Jiang zhong zheng yu qian tai chu qi zhi li fa yuan : yi dian li jia jia an wei he xin de tao lun” [Chiang Kai-shek and Legislature in the 1950s : A discussion of Utility Price Reform]. In Huang Ko-wu eds., “*Tong zhou gong ji jiang zhong zheng yu yiji wu nian dai de taiwan*” [On the Same Boat, Chiang Kai-shek and Taiwan in the 1950s], pp. 129-206. Taipei: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Office.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5.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 Amsden, Alice H..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msden, Alice H.. 2001. *The Rise of 'The Rest': Challenges to the West from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reoni, Antonio. 2016. "Varieties of Industrial Policy: Models, Packages, and Transformation Cycles." In Akbar Noman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Efficiency, Finance, and Varieties of Industrial Policy*, pp. 245-305.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Andreoni, Antonio and Ha-Joon Chang. 201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policy: 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ies, policy alignmen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48: 136-150.
- Aiginger, Karl, and Dani Rodrik. 2020. "Rebirth of Industrial Policy and an Agenda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20 (2): 189-207.
- Armendáriz, Beatriz, and Felipe Larraín. 2017. *The Economics of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Aspalter, Christian. 2006. "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5 (4): 290-301.
- Aspalter, Christian. 2017. "Ten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an ideal-typical perspectiv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 Baer, Werner. 1972. "Import Substitu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Experiences and Interpretation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7 (1): 95-122.
- Bhagwati, Jagdish. 1982. "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DUP) Activ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 (5): 988-1002.
- Bizzarro, F., Gerring, J., Knutsen, C., Hicken, A., Bernhard, M., Skaaning, S., Lindberg, S. (2018). "Party Strength and Economic Growth." *World Politics*, 70 (2): 275-320.
- Buchanan, Paul G., and Kate Nicholls. 2003. "Labour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8 (2): 203-237.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lastair Smith,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ames D. Morrow. 2003.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aldentey, Esteban Pérez. 2008. "The Concept and Evolu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7 (3): 27-53.
- Cammett, Melani 2007.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and Industrial Change: The Politics of Upgrading in Morocco and Tunisia." *World Development*, 35 (11): 1889-1903.
- Chang, E. C. C., & Wu, W.-C. 2016.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Income Inequality, and Authoritarian Survival."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9 (2), 281-294.
- Chang Ha-Joon. 1998. "Korea: The Misunderstood Crisis." *World Development*, 26 (8): 1555-1561.
- Chang, Ha-Joon. 2008. *Bad Samaritans: 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 Chang, Ha-Joon, and Kiryl Zach. 2019. "Industri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eepak Nayyar ed., *Asian Transformations: An Inquir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pp. 186-2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rron, Nicholas, and Victor Lapuente. 2011. "Which Dictators Produce Quality of Govern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6 (4): 397-423.
- Chen, Tain-Jy. 2014. *Taiwan's Industrial Policy Since 1990*.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Cheng, T.-J. 1993. "Guarding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State as Banker in Taiwan." in S. Haggard, C. H. Lee and S. Maxfield eds., *The Politics of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p. 55-92.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Tun-Jen, Stephan Haggard and David Kang. 1998.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Korea and Taiwan: The bureaucrac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4 (6): 87-111.
- Cherif, Reda and Fuad Hasanov. 2015. "The Leap of the Tiger: How Malaysia Can Escape the Middle-Income Trap." *IMF Working Paper*, No. 15/131, June 23.
- Cherif, Reda, Fuad Hasanov, and Alfred Kammer. 2016. "Lessons for Today and the

- Way Forward.” *Breaking the Oil Spell: The Gulf Falcons’ Path to Diversification*.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ress.
- Cherif, Reda, and Fuad Hasanov. 2019. “The Return of the Policy That Shall Not Be Named: Principles of Industrial Policy.” *IMF Working Paper No. 2019/074*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Chi, Do Quynh, Nguyen Huyen Le, and Hoang Xuan Diem. 2020. “From Industrial Policy to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Vietnam.” In *Core Labour Standards Plus Project, Phase II*.
- Choi, Jaedo and Andrei Levchenko 2021.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Industrial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29263*.
- Chu, Yun-han. 2002. “Re-engineering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Taiwan in Defiance of Neo-liberalism.” *China Review*, 2 (1): 29-59.
- Chu, Yin-wah. 2016. “The Asian Developmental State: Ideas and Debates.” In Chu, Yin-wah ed., *The Asian Developmental State: Reexaminations and New Departures*, pp. 1-2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hu, Yun-han and Chie-En Wu. 2019.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gime Type.” In Chong-Min Park, Eric M. Uslaner eds.,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in East Asia*, pp. 96-115. London: Routledge.
- Doucouliafos, Hristos, and Mehmet Ali Ulubaşoğlu. 2008.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Meta-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 (1): 61-83.
- Doner, Richard F. 2009. *The Politics of Uneven Development: Thailand’s Economic Growth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rsch, Michael T., and Paul Maarek. 2019.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Conditional Dynamic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3 (2): 385-404.
- Eichengreen, Barry, and David Leblang. 2008. “Democracy and Globalizatio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 (3): 289-334.

-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Peter, and Patrick Heller. 2019. "The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Deepak Nayyar ed., *Asian Transformations: An Inquir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pp. 109-13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eckenstein, Timo, and Lee, Soohyun Christine. 2017. "Democratization, post-industrialization, and East Asian welfare capitalism: the politics of welfare state reform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33 (1): 36-54.
- Fukuyama, Francis. 2013. "What is Governance?" *Governance*, 26 (3): 347-368.
- Fuller, Douglas B. 2016. *Paper tigers, Hidden drag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uller, Douglas B. 2018.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President Ma." In Assessing the Presidency of Ma Ying-jiu in Taiwan, eds., *Beckershoff and Schubert*, pp. 208-223. London: Routledge.
- Gough, I. 2004. "East Asia: the Limit of Productivist Regimes." In I. Gough, G. Wood, A. Barrientos, P. Bevan, P. Davis and G. Room eds., *Insecurity and Welfare Regime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Social Policy in Developmental Contexts*, pp. 169-20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uliano, Paola, Prachi Mishra, and Antonio Spilimbergo. 2013. "Democracy and Reforms: Evidence from a New Datase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5 (4): 179-204.
- Haber, Stephen, and Enrico Perotti.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ial Systems." *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 08-045/2. Amsterdam: Tinbergen Institute.
- Haggard, Stephan. 1990.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ggard, Stephan. 2015.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s Dead: Long Live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y Thelen eds., *Advances in Com-*

- 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pp. 39-66.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ggard, Stephan. 2018. *Developmental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nkla, C. R.. 2006. "Party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9 (9): 1133-1156.
- Harrison, Ann, and Andrés Rodríguez-Clare. 2010. Chapter 63,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Polic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pp. 4040-4098. London: Elsevier.
- Hatta, Tatsuo. 2017. "Competition Policy vs. Industrial Policy as a Growth Strategy."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0 (2): 162-174.
- He, Alex. 2021. "China's Techno-Industri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IGI Paper*, No. 252 <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chinas-techno-industrial-development-case-study-semiconductor-industry/>
- Hill, Hal. 201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Insights from Southeast Asia."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30 (1): 108-130.
- Hirschman, Albert O., 196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2 (1): 1-32.
- Holliday, Ian. 2000. "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tudies*, 48 (4): 706-723.
- Houle, Christian. 2009.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 Why Inequality Harms Consolidation but Does Not Affect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61 (4): 589-622.
- Hsieh, John Fun-sheng. 2005. "Ethnic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40: 13-28.
- Hsieh, Michelle F. 2016. "Embedding the Economy: The State and Export-Led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 Chu, Yin-wah ed., *The Asian Developmental State:*

- Reexaminations and New Departures*, pp. 73-9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uang, Ya-sheng. 2008.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hien-chung and Yeun-Wen Ku. 2011.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Welfare Programmes in East Asia: A Case Study of Taiwan." *Social Policy Administration*, 45 (7): 733-751.
- Hwang, G. J.. 2011. *New Global Challenges and Welfare State Restructuring in East Asi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Irwin, Douglas A. 2021. "How Economic Ideas Led to Taiwan's Shift to Export Promotion in the 1950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9298. Cambridge, MA: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Kanapathy, Vijayakumari, Herizal Hazri, Pasuk Phongpaichit and Pornthep Benyaapikul. 2014. "Middle-Income Trap: Economic Myth, Political Reality. San Francisco, CA: The Asia Foundation. Available at The Asia Foundation." <https://asiafoundation.org/2014/01/13/asia-foundation-launches-middle-income-trap-economic-myth-political-reality-case-studies-from-malaysia-and-thailand/>.
- Kanchoochat, Veerayooth, Trin Aiyara, and Bank Ngamarunchot. 2021. "Sick Tiger: Social Conflict,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and Exclusive Growth in Thai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51 (5): 737-758.
- Kasahara, Shigehisa. 2013. "The Asian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 *UNCTAD Discussion Paper*, no. 213.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of Erasmus University (ISS).
- Katz, J., and Kosacoff, B. 2000.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Argentina, 1940-80: Its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In Cárdenas, E., Ocampo, J.A., Thorp, R. ed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Latin America, St Antony's Series*, pp. 282-313. London : Palgrave Macmillan.
- Kay, Cristóbal. 2002. "Why East Asia overtook Latin America: Agrarian reform, in-

- dustrialis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23 (6).
- Kim, Hansung, Sooyeon Huh, Sangmi Choi and Yushin Lee. 2018.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Attitudes Towards Redistribution in Four East Asian Welfare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7 (1): 28-39.
- Kim Kihwan and Danny M. Leipziger. 1997. “Korea: A Case of Government-Led Development.” In Danny M. Leipziger ed., *Lessons from East Asia*, pp. 155-21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Kim, Minhoo, Munseob Lee, and Yongseok Shin 2021. “The Plant-Level View of an Industrial Policy: The Korean Heavy Industry Drive of 1973.” *NBER Working Paper 29252*.
- Kriekhaus, Jonathan, Byunghwan Son, Nisha Mukherjee Bellinger, and Jason M. Wells. 2014.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Suppor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6 (1): 139-151.
- Krueger, Anne O., 1995. “East Asian Experience and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NBER Chapters, in: *Growth Theories in Light of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pp. 9-3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 Lane, Nathaniel. 2020. “The New Empirics of Industrial Policy.”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20: 209-234.
- Lane, Nathaniel. 2022. “Manufacturing Revolutions - Industrial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South Korea.” Manuscript.
- Lardy, Nicholas R. 2014. *Markets over Mao: Th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auridsen, Laurids S. 2008. *State,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Deepening and Upgrading Policies in Taiwan and Thailand Compared*. Vol.2. Shaker Verlag GmbH, Germany.
- Lawrence RZ, Weinstein DE. 2001. “Trade and growth: import led or export led?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Korea.” In Stiglitz JE, Yusuf S. eds.,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pp. 379-408. 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Yoonkyung. 2009. "Divergent Outcomes of Labour Reform Politics in Democratized Korea and Taiwa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4 (1): 47-70.
- Lee, Yoonkyung. 2011. *Militants or Partisans: Labour Union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in Korea and Taiwan*.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Yoonkyung. 2015. "Labour after Neoliberalism: The Birth of the Insecure Class in South Korea." *Globalizations*, 12 (2): 184-202.
- Lehmann, Sibylle H., and Kevin H. O'Rourke. 2011. "The Structure of Protection and Growth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 (2): 606-616.
- Lin, Justin, and Ha-Joon Chang. 2009. "Should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form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 or Defy it? A Debate Between Justin Lin and Ha-Joon Chang."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7 (5): 483-502.
- Mahon, James. 1992. "Was Latin America too Rich to Prosper? Structural and political obstacles to export-led industrial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8 (2): 241-263.
- Manow, Philip. 2021. "Models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Francis G. Castles, Stephan Leibfried, Jane Lewis, Herbert Obing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 pp. 787-802, Christopher Pierson.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nger, Mark S., and Kenneth C. Shadlen. 2015.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Lisa L. Marti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 47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ade, James. 1949. *Planning and the Price Mechanism: The Liberal-Socialist S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 Mkandawire, Thandika, and Ilcheong Yi. 2014. "Overview: Learning from Developmental Success." In Ilcheong Yi and Thandika Mkandawire, eds., *Learning from the South Korean Developmental Success*, pp.1-7.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Montes, Manuel. 2019. "Southeast Asia." In Deepak Nayyar ed., *Asian Transformations: An Inquir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pp. 504-53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nger, Michael. 2022. "A "Good" Industrial Policy is Impossible: With an Application to AB5 and Contractor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Policy*. 17 (3): 517-547.
- Nishijima, Shoji. 2012.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http://repositorio.ipea.gov.br/bitstream/11058/6422/1/PWR\\_v4\\_n3\\_Japanese.pdf](http://repositorio.ipea.gov.br/bitstream/11058/6422/1/PWR_v4_n3_Japanese.pdf)
- Noman, Akbar, and Joseph E. Stiglitz. 2016. "Learning,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y Polices: An Overview." In Akbar Noman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Efficiency, Finance, and Varieties of Industrial Policy Guiding Resources,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for Sustained Growth*, pp. 1-2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Okazak, Tetsuji. 2017. "Industrial Policy in Japan: 70-Year History since World War II." *Japan SPOTLIGHT*, March / April: 57-61.
- Okimoto, Daniel. 1989. *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Ormrod, D. 2003. *The Rise of Commercial Empires: Eng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o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1650-17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ck H, Saggi K. 2006. "Is There A Case For Industrial policy? A Critical Survey."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1 (2): 267-297.
- Palma, J. G.. 2019. *The Chilean Economy Since The Return To Democracy In 1990: How to get an emerging economy growing, and then sink slowly into the quicksand of a "middle-income trap*.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Park, Yongjin. 2018. *Modern Korean economy: 1948-2008*. Translated by Seongbak (Jamie) Jin. gyeonggi-do: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 Park, Chong-Min and Eric M. Uslaner. 2021.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 Peng, Ito, and Joseph Wong. 2010. "East Asia." In Francis G. Castles, Stephan Leibfried, Jane Lewis, Herbert Obinger, Christopher Piers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 pp.787-802.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rkins, Dwight H. 2013. *East Asian Development: Foundations and Strategies*.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tri, Peter. 1997. "Common Foundations of East Asian Success." In Danny M. Leipziger ed., *Lessons from East Asi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Phongpaichit, Pasuk, and Chris Baker. 1999. *Thailand's Crisis* Silkworm Books, Chiang Mai, Thailand.
- Rahim, Lily Zubaidah, and Lam Keong Yeoh. 2019. "Social Policy Reform and Rigidity in Singapore's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 State." In L. Z. Rahim and M. D. Barr eds., *The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in Singapore's Developmental State*, pp. 95-130.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 Rasmussen, M., and Knutsen. 2021. "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 (3): 1203-1229.
- Reuveny, Rafael and Quan Li. 2003. "Economic Openness, Democracy, and Income Inequa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6 (5): 575-601.
- Robinson, James A. 2009.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World Bank ABCDE conference in Seoul, Korea*, June 22-24.
- Rodrik, Dani. 1995. "Getting Interventions Right: How South Korea and Taiwan Grew Rich." *Economic Policy*, 10 (1): 55-107.
- Rodrik, Dani, and Ricardo Hausmann. 2006. *Doomed to Choose: Industrial Policy as Predica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udra, N. 2007. "Welfar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que or universal?" *Journal of Politics*, 69 (2): 378-396.
- 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e Huber Stephens, Evelyne Huber, John D. Ste-

- 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h, Raaj. 1991. "Fallibility in Human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2): 67-88.
- Shih, Victor. 2020. *Economic Shocks and Authoritarian Stability: Duration, Financial Control, and Institutions*.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ilva, E.. 2007. "The Import-Substitution Model: Chil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34(3): 67-90.
- Son, Byunghwan. 2016. "Are the Poor the Weak Link? Democratic Support and Income Levels in Post-crisis South Kore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6 (2): 219-237.
- Steinberg, David A., and Krishan Malhotra. 2014. "The Effect of Authoritarian Regime Type on Exchange Rate Policy." *World Politics*, 66 (3): 491-529.
- Suh, Chung-Sok, and Seung-Ho Kwon. 2014. "Whither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Balancing Welfare and Neoliberalism." *Asian Studies Review*, 38 (4): 676-692.
- Terzi, Alessio, Aneil Singh and Monika Sherwood. 2022. "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Lessons from the Past." *European Economy Discussion Paper*, 157.
- Thurbon, Elizabeth. 2016. *Developmental Mindset: The Revival of Financial Activism in South Kore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immons, Jeffery F.. 2010. "Does Democracy Reduce Economic Inequ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 (4): 741-757.
- Ukhova, Daria. 2015. "Gender Inequality and Inter-household Economic Inequality in Emerging Economies: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Gender and Development*, 23 (2): 241-259.
- Underhill, Geoffrey R. D., Xiaoke Zhang. 2005. "The changing state-market condominium in East Asia: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underpinnings of development."

*New Political Economy*, 10 (1): 1-24.

Wade, Robert. 2004.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de, Robert. 2014. "The Paradox of US Industrial Policy: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Disguise." In José M. Salazar-Xirinachs, Irmgard Nübler and Richard Kozul-Wright eds., *Transforming Economies: Making Industrial Policy Work for Growth, Jobs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Wade, Robert. 2018.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Dead or Aliv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9 (2): 518-546.

Weiss, Linda. 2003. *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Bring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ng, Joseph. 2004. "The Adaptiv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4 (3): 345-362.

Wong, Joseph. 2005. "Re-Making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aiwan: The Challenges of Bio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6 (2): 169-191.

Wong, Mathew YH. 2014. "The Politics of the Minimum Wage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4 (4): 735-752.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u, Chin-en. 2012. "When is Democracy Better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When is it No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y and Structural Factor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7 (4): 365-388.

Wu, Wen-chin and Yu-Tzung Chang. 2019. "Income Inequality, Distributive Unfairness, and Support for Democracy: Evidence from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Democratization*, 26 (8): 1475-1492.

Wu, Chin-en, Sook Jong Lee, and Kaustuv Kanti Bandyopadhyay. 2021. "Conclusion: Sources and Features of Asian Democracies." In Sook Jong Lee, Chin-en

Wu, and Kaustuv Kanti Bandyopadhyay eds., *Populism in Asian Democracies*, pp. 211-226. Leiden: Brill.

Yeh, Chung-yang and Yeun-Wen Ku. 2020. “Welfare Attitu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lism in New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An Examination of the Taiwanese Case.”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14 (1): 13-29.

Yülek, Murat A, Kwon Hyung Lee, Jungsuk Kim, and Donghyun Park. 2020. “Correction to: State Capacity and the Role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Automobile Indust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urkey and South Korea.”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20 (2): 307-331.

